

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

馆刊
总第十一期



2014.12

目 录

Contents

研究与探索

- 4 从过去到未来
——关于博物馆教育的思考 傅 强
- 12 试论宋庆龄的文化品味 王宁宁

宣教论坛

- 18 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社会教育工作的实践
宣教部
- 22 “指尖上的故居”
——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微信平台运营小记
吴颖嫣

陈展天地

- 24 “孙中山宋庆龄印章珍藏展”办展心得 水 草
- 29 “深情厚谊——宋庆龄与周恩来、
邓颖超的交往”策展纪实 花婆婆

馆藏研究

- | | | |
|----|---------------|-----|
| 33 | 孙中山宋庆龄印章漫谈 | 宫洁菁 |
| 38 | 一件美国钞票公司印样 | 麦灵芝 |
| 42 | 朝鲜刺绣挂屏《春香传》小考 | 高海涛 |

文博之道

- | | | |
|----|----------------|-----|
| 44 | 当年我们为主楼做的防潮措施 | 周和康 |
| 46 | 彩髹描金漆櫨修复复制综叙 | 王克华 |
| 51 | 浅谈故居安全工作中的安全用电 | 葛伟峰 |

馆建工作

- | | | |
|----|----------------|-----|
| 53 | 大英博物馆见闻录 | 费佳 |
| 57 | 关于纪念馆服务工作的几点假想 | 许毅捷 |

藏书选译

- | | | |
|----|----------------------------------|-----|
| 59 | 《最后的女皇
——蒋介石夫人和现代中国的诞生》选译（连载） | 宫洁菁 |
|----|----------------------------------|-----|

资讯快车

- | | |
|----|------|
| 70 | 故居新闻 |
|----|------|

图版

宋庆龄收藏的印章

从过去到未来 ——关于博物馆教育的思考

撰文 / 傅强

博物馆的教育功能越来越为人们所重视，2007年8月24日，国际博物馆协会新修改的《国际博物馆协会章程》，将“教育”调整到博物馆业务目的的首位，取代了多年来将“研究”置于首位的认识。宋向光认为，这实际上“反映了国际博物馆界近年来对博物馆社会责任的强调，反映了对博物馆社会效益的关注，也反映了博物馆在工作态度上更采取外向的选择”^[1]。

国内博物馆界对博物馆的教育职能也日趋重视，客观地说，近年来，我国的博物馆教育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博物馆教育的内容和形式日益趋向多元，对博物馆教育的探索也进入了一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时代。然而不可否认的是，我们的博物馆教育还存在着诸多问题，而对这些问题的思考 and 解决，正是未来的博物馆教育前行的方向。

一、博物馆教育的现状

随着我国博物馆理论的不进步发展，人们对博物馆教育的认识也随之不

断深化。二十年来，许多博物馆的社教部门陆续经历了从“群工部”到“宣教部”再到“社教部”的转变，随着一大批专业的博物馆教育人员的成长成才，随着他们在博物馆教育实践和理论层面的探索与总结，人们对博物馆的社会教育功能有了新的认识。其实，社教部门称谓的转变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种认识的转变：我们不再将“教育”等同于“群众工作”或是“宣传”，我们开始认识到教育不仅是博物馆的基本职能，而且是最为重要的基本职能，博物馆的教育是社会教育的一种，它有其自身的规律，也有其自身的特点，探讨博物馆教育从根本上来说就是在探讨博物馆与观众的关系。可以预见的是，博物馆教育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为博物馆理论发展的重点和热点。

当下博物馆教育的发展包括了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在实践层面，今天的博物馆教育可谓“百花齐放”：讲解模式的创新、讲解员队伍的建设、教育展项的设计、博物馆课程的开发、教育活

动的策划、多媒体技术的利用、新媒体平台的使用，此外，还包括传统博物馆教育活动的延续，例如博物馆讲座、流动展览、文艺演出等。从理论层面来说，则是“百家争鸣”，博物馆教育实践的多元化，其实正是代表着博物馆教育在不同方向上的探索，而这种探索往往也会变为理论层面的讨论，例如，讲解工作与博物馆教育的关系究竟是怎样的？博物馆的教育活动与博物馆的陈列设计如何统一起来？博物馆的课程与学校的课程有何相似之处？又有何不同？博物馆的教育活动如何兼顾娱乐性和教育性？多媒体的使用究竟是弱化了文物展品的作用，还是为博物馆的教育活动开启了新的可能？在新媒体时代，博物馆教育又将如何创新和发展？

二、博物馆教育诸问题

关于当下博物馆教育存在的问题，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宋新潮有过一段精辟的阐述：“一些博物馆部门间划分势力范围、部门之间沟通少，遇到事情相互推诿，很少把注意力或工作的重心放在观众身上；博物馆领导者对博物馆的公众教育职能认识不足，以致一些博物馆在建筑设计上就是一个‘宝盒’的观念，把博物馆功能错误地理解为只是‘藏宝’，博物馆人仅扮演着‘文物仓库’保管员的角色；博物馆教育职能被简单地理解为是社教部门的责任，全部推给博物馆的讲解员来完成，以‘讲解’替代博物

馆教育。博物馆内部之门的紧闭已严重影响了博物馆教育职能的发挥。”^[2]

正如上文所引，我们可以从三个层面来分析当下博物馆教育存在的问题：对观众的忽视、对教育职能的误解、部门间的壁垒。

1、对观众的忽视

时至今日，没有博物馆人会说：观众无足轻重。但是，长久以来所形成的思维定势和工作习惯，却仍然在不知不觉中影响着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并没有像我们所声称的那样，把观众的感受置于一切工作之上。

例如，“文物的保护和利用”长久以来一直是一个争论不休的话题，我们始终把“对文物的保护”和“更好地利用文物服务于观众”视作一对矛盾。但是，如果我们真的认真去考虑观众对博物馆的生存的重要性，也许，这个问题就不会显得那么难以解决。

可以举一个极端的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要延长文物的寿命，确保万无一失，最好的办法莫过于将其层层保护，然后深锁库房。但是，如果文物永远存在于库房，而从来没有进入过公众的视界，那么，这件文物的价值又体现在何处呢？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存在库房的文物有些类似存在银行的存款，如果它始终不进入流通领域，它从来没有被用来购买商品，那么，它就只是账户中的一串数字而已，只有象征意义。对观众来说也是如此，博物馆中的文物是公共财富，

它之所以存放于博物馆的库房中，是因为博物馆有专业的人力和智力资源来保护、研究和展示文物，从这个角度来说，博物馆并不是文物的所有者（就公立博物馆而言），而是监护者、管理者，是公众授权我们保护和管理这些属于全人类的共同财富。如果我们打着保护文物的名义，无论是出于“公益”还是“私利”，将文物永远置于库房之中，这其实是一种失职。或是我们仅仅考虑对文物的保护，而无视公众的权益，在公众与属于公众的文物之间设置重重障碍，那么，我们可能需要自问：收集和保护这些文物的最初目的又是什么？

从博物馆教育的角度来说，即便是专业的社教部门，也可能忽视观众的感受。教育工作者需要时时自问：我们在设计和实施教育活动、教育项目时，更多考虑的是观众的需求还是我们自身的条件？当我们的教育活动效果不理想，观众不感兴趣时，我们的做法是去征询观众的意见，还是抱怨客观条件的不完善或是观众的不配合？当我们的教育活动取得成功时，我们有没有想到收集观众的反馈，还是沾沾自喜，急于总结成功经验？

2、对教育职能的误解

博物馆教育与讲解的关系到底是什么？这个问题可能会困扰很多人。其实，对很多人来说，这两者之间是可以画上等号的。博物馆的优势资源是什么？是文物和展品。博物馆如何教育人？通过

文物和展品教育人。怎么让文物和展品教育人？通过讲解员的解说。这是一种常见的逻辑，笔者并不认为这种逻辑有什么问题，我想指出的是，作为博物馆教育工作者，除了这样的逻辑之外，可能还需要重新审视博物馆教育的内涵和外延。

博物馆教育有哪些形式？讲解肯定是其中的一种，但是正如上文所述，博物馆教育的形式其实是多元的。从最广义的角度来说，观众在博物馆开展的一切活动都可以被视为博物馆的教育活动。观看展览是接受教育、参加活动是接受教育、聆听讲解是接受教育、阅读出版物是接受教育，甚至在纪念品商店流连也可被视作博物馆教育的一种——因为这些商品或多或少与博物馆的陈列主题相关。也就是说，博物馆的方方面面，只要与观众直接发生关系，都可被视作博物馆教育的组成部分。认清这一点，对于我们的启示在于，博物馆的教育绝不仅限于讲解，陈列设计、学术研究、活动策划、产品开发……都有它的教育意义。

不过，仅仅讲外延是不够的，对博物馆人来说，更重要的问题是：博物馆教育的内涵究竟是什么？在笔者看来，博物馆教育至少应关注两个层面：传承文化、启迪心智。一座博物馆，无论它陈列展示的是艺术精品、科学技术还是人文历史，其目的都是将人类文明智慧的结晶和上下求索、不断演进的过程呈

现给今天的人们。因为我们相信，今天的人们有必要知道我们今天的文明从何而来、我们自己从何而来——这是一种关于传承的教育。博物馆教育的另一个层面则试图回答另一个问题：我们将去向何处。博物馆的展示并不仅仅是为了铭记和怀念，其更重要的意义在于，我们将从人类过往的道路中得到启迪：不仅从人类优秀的文化成果中摄取智慧，还要从人类历史的黑暗面（如大屠杀、集中营）中取得教训，而这些智慧和经验都将启迪我们、帮助我们思考和探索人类未来的道路——我们不仅要传承过往的知识，更要创造新的知识。

3、部门间的壁垒

博物馆人常常会谈论部门间的壁垒，研究部门和陈列部门之间，文保部门和教育部门之间，由于本职业务、工作目标不尽相同，冲突和矛盾在所难免，很多时候，这甚至成为一种“潜规则”。其实，除了我们日常看到的矛盾冲突之外，部门间的壁垒还会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表现如来，只不过，有时候，我们对此已习以为常，不认为这是部门间缺乏沟通的表现或结果。

例如，我们常常会把“一群学生在博物馆里席地而坐，一边听一边在膝盖上做笔记，老师或者讲解员对着展品进行现场授课”——这样一幅画面作为博物馆教育最具代表性的场景。但是，这样的画面有没有值得我们去反思的地方呢？这样的一种博物馆教育的方式是否

也透露出些许无奈？为什么一定是坐在地上？为什么一定是在看起来不那么适合开展教育活动的展厅里来开展博物馆教育？且不论会不会与其他参观者相互影响，孩子们真的喜欢这样的方式吗？对坐在最后几排的孩子来说，他与展品距离可能等于甚至大于平时与黑板的距离，这个时候，现场教育的意义又何在呢？

这里的问题就在于，在进行博物馆陈列设计的时候，我们并没有为将来可能发生的现场教学留下空间。这是因为，在大多数时候，教育部门是不会直接参与到陈列设计中的，而负责陈列设计的部门往往只是从展示的内容和形式来考虑布展，至于展厅的布局是否适合开展教育活动？有没有可能在不破坏陈列整体效果的前提下留出一块空间专门用于现场教学？这些问题很少会被提及。

所以，部门间的壁垒对博物馆教育的影响可能比我们想象的更大。要解决这个问题，仅仅强调“加强部门之间的沟通”、“领导做好协调工作”、“成立跨部门的工作小组”也许还不够，因为，部门间的利益冲突、势力范围的划分其实只是表象，问题的根源其实还是在于陈旧的观念。如果我们能就“‘教育’是‘征集、保护、研究、传播、展出’等博物馆基本业务的共同目的，博物馆各项业务活动都应贯彻‘教育’的目的，不应将本职业务的内容作为自己的工作目的”这一点达成共识，那么部门间的

壁垒自然也就不复存在了。

三、博物馆教育的未来

对上述问题的思考和解决，其实正是未来的博物馆教育探索和前行的方向。如果我们把博物馆的教育活动视为一种文化产品，那么，我们势必将更加关注观众的需求和感受。要纠正对博物馆教育职能的误解，就应将博物馆教育置于社会教育的大背景下，重新定位和思考。而打破部门间的壁垒，提升我们对博物馆教育职能的认识，从根本上来说，正是为了向公众提供更好的博物馆教育。

1、作为“文化产品”的博物馆教育

虽然国内的博物馆性质、归属、定位不尽相同，但是有一点是共性的，那就是，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背景下，无论我们的博物馆如何看待自身，它都不可避免地会被视作向公众提供文化服务的公共文化服务机构。此时，博物馆的展览、教育活动、出版物等就成为我们向公众提供的文化产品。

从这个视角来理解我们的博物馆教育，就意味着，未来的博物馆教育势必更加重视观众的需求。事实上，今天的观众确实面临着越来越多的选择，人们越是重视教育，各类教育培训机构也就应运而生，针对不同需求、不同对象的教育产品也就越来越丰富，作为文化产品，博物馆教育的竞争对象包括了各类培训班、兴趣班、体验班、拓展训练、野外活动、社会实践……

与这些教育活动、教育产品相比，博物馆教育因其“出生高贵”，往往具有先天的优势（这样的优势尤其体现在大型公立博物馆），人们对博物馆的教育产品常常抱以更多的信任，相对于各类培训机构，他们更愿意相信博物馆提供的教育产品。但是如果我们的博物馆教育因此而不思进取，不去思考如何改善教育体验和提高教育效果的话，那么，这样的先天优势很快就会丧失。例如，对大多数中小学来说，组织学生到博物馆、纪念馆参观是一种重要的教育方式。但是，大多数博物馆并没有针对这样的参观学习去设计一种行之有效的教育活动，而是用接待普通团队观众的方式去接待这些学生。这样的结果就是，一方面，学校会认为这样的参观学习收效甚微，不如把时间留给课堂。另一方面，学生会认为这样的参观是一种走形式、走过场，从而对博物馆留下不那么好的印象，最后真正受到伤害的，是博物馆的声誉。

所以，未来的博物馆教育应该更加重视精心设计、开发高质量的教育产品，通过教育产品本身的质量甚至口碑来吸引观众的参与，而不是仅仅依靠博物馆的声望。博物馆教育应该努力寻找博物馆资源与社会需求的契合点，为公众提供更为多样化和个性化的选择。例如，博物馆在引入诸如雕塑、绘画或书法展览的同时，是否可以配套教导观众如何去欣赏、鉴赏这些艺术品的教育活动？博物馆教育还应广泛吸取社会上各类成

功教育产品的经验，为我所用。例如，很多拓展训练更加强调参与者之间的相互教育而非组织对参与者的教育，博物馆教育也是如此，参与者与社教人员之间并非只能是“教”与“学”的关系，参与者之间的相互启发，参与者与社教人员之间的互动，其实往往更重要。最后，与所有的文化产品一样，博物馆教育也应重视创意和创新，文化产品之间的竞争不是财力的较量而是脑力的较量，博物馆教育如果希望在文化市场占据一席之地，那么打破固有思路、不断创新教育产品是不二选择。

2、作为“社会教育”的博物馆教育
讨论作为“社会教育”的博物馆教育，绕不开这样一个问题：博物馆教育与学校教育的关系。其实，这也是近年来博物馆社教同仁讨论的热点，多数观点认为博物馆教育是学校教育的第二课堂，博物馆与学校之间应该是主与辅的关系，博物馆应主动配合、适应学校教育，是学校教育的有效补充。但是，也有观点认为，这样的定位夸大了学校教育的主体性，放弃了博物馆社会教育的主体性，弱化了博物馆社会教育的整体功能，从而让博物馆的社会教育处于从属的、被动的、机械的尴尬境地。

笔者认为，上述两种观点其实都是围绕着一个共同的问题，那就是博物馆教育与学校教育如何能够更好地互为补充，共同发挥作用。把博物馆教育作为学校教育的附庸的观点确实不可取，博

物馆教育与学校教育的结合，不应该是单向度的。事实上，根据美国学者史蒂芬·康恩的研究，博物馆教育曾经是“创造和整理智识的主要场所”，它在智识生活扮演着领军角色，它“通过对待物品时细致而系统的方式激发了创造性的研究”，当然更重要的是，博物馆不仅是创造新智识的场所，而且“能够免费地将这些智识带给人民”^[3]。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即使在今天，学校早已成为智识生活的主要领域，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博物馆教育就应成为学校教育的附庸，如今，终生教育早已成为共识，而学习被理解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博物馆教育的对象，恰恰应该是走出学校的“主动的闲逛者”。

现代教育理论会从主动与被动，功利与非功利四个维度来区分各种学习行为，按照这种观点，博物馆教育应该是一种主动非功利的学习，这就决定了博物馆教育的内容和形式都将区别于学校教育。例如学校教育往往是系统的、完整的，而博物馆教育活动往往都是一次性的、片段式的。所以，对未来的博物馆教育来说，不一定要以建构完整的课程体系为己任，社教工作者要解决的问题应该是：如何利用有限的展品和碎片化的时间来最大限度地启发观众去学习和思考。我们应该培养观众的观察能力和学习能力，让观众学习如何自己去发现和获得知识；在策划教育活动时，不应包罗万象，试图涵盖整个陈列体系，

而应注重恰当地引导和激发观众自身的兴趣；呈现在说明牌和教育手册上的文字，不应是结论，而应是观点，作为博物馆，应始终保持客观和中立；对社教工作者或是讲解员来说，不仅要学习如何讲述，更要知道如何提问，因为，一个发人深思的问题要比一段冗长的陈述更能启迪观众、增加智慧。

3、什么是好的博物馆教育

无论是重新思考博物馆教育的内涵和外延，还是将博物馆教育视作文化产品，抑或打破部门之间的壁垒，建立对博物馆教育的共识，其最终目的就是希望在未来能够看到一种更好的博物馆教育。

那么，什么是好的博物馆教育？如何创造好的博物馆教育？

首先，我们需要以一种更为开放的思路来开展未来的博物馆教育。正如上文所指出的，博物馆发生的一切与观众有关的活动都可以视为一种教育活动，这一点，我们不妨参考《史密森教育研究报告》，将博物馆的愿景、观众和教育项目、专业培训、组织文化、领导能力、管理、组织结构、合作、财政资源、人力资源、空间与设施、技术全部纳入博物馆教育的框架，并在此基础上设计博物馆教育的总体方案。同时，博物馆教育的思路也不应局限于学校教育或是校外教育，博物馆的所有观众都是博物馆教育的对象，博物馆教育的内容和形式都应是开放性的，正如格林黑尔所言，

博物馆的教育可以“包括一系列结构性的或非正式的行为：实践工作室、课程、电影、音乐会、时尚表演、展览、展示、出版、录像、剧院、流动汽车或火车等”^[4]，博物馆的教育活动既是多样性的，同时又是“无止境”的。

其次，未来的博物馆教育应该更加重视“启示”而非“再现”。如果说博物馆的陈列是基于特定的话语体系或权力结构来“合理的安排和展出”展品，是“再现”。那么博物馆的教育就应该更加注重对观众的“启示”，让观众有可能发现展品在话语体系之外的含义，或者说，开启对展品进行多角度解读的可能性。也就是说，博物馆的陈列与教育之间可以存在一种特殊的张力。举例来说，随着大众文化程度的提高和信息获得渠道的多元化，今天的观众往往对那些政治倾向明显的历史决定论抱着怀疑的态度。他们到展厅是希望看到更真实的历史——因为文物比文字更可信，这个时候社教工作者往往面临着两种阐释方式的选择：一种是从更微观的层面对展品进行解读，也就是讲文物及其背后的故事，从而在更深更可信的层面完成对陈列主题呈现，发挥宣传功能；另一种则是借助展品将历史本身的多元性和多角度解读的可能性完整地呈现给观众，让观众自己去思考和领悟，实现教育功能。而笔者认为，未来的博物馆教育，更需要的是后者。

最后，关于博物馆教育的评价机制

也应在未来进入我们的视野。任何事业要走上正轨，要良性发展，势必需要一套良好的评价和反馈机制。今天，我们对博物馆的教育活动虽然也有一些评价标准，但是这些评价往往是比较片面甚至有些偏颇的，例如，有些博物馆，评价教育活动是否成功，仅仅是看活动的参与人数，或是开幕式的规模，而对活动的意见反馈往往只关注领导的态度或是部分专家的意见，却忽视了教育活动的真正受众——观众。未来的博物馆教育必须建立起一套更为严肃的评价机制，这种评价机制，首先要考量教育活动目标群体对活动的感受和反馈，然后要观察教育活动的辐射面和辐射效果，最后还应收集社会公众对活动的评价。可喜的是，已经有博物馆开始了这方面的探索，例如上海教委在2014年开展的一项文教结合的项目中，就引入了第三方评

价的机制，邀请社会上的评估公司对承接教育项目的博物馆进行评估，这种评估不仅让教委对项目的开展情况和实施绩效有了客观的了解，也帮助博物馆的社教工作者认真审视自己开发的教育项目究竟有没有达到预想的效果。



[1] 宋向光：《国际博协“博物馆”定义调整的解读》，《中国文物报》，2009年9月16日。

[2] 王芳：《为了明天的课程：史密森教育研究》，暨南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6页。

[3] 史蒂芬·康恩：《博物馆与美国的智识生活，1876—1926》，上海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16页。

[4] 罗杰·迈尔斯：《面向未来的博物馆——欧洲的新视野》，北京燕山出版社2007年版，第157页。

（上接17页）

[20] 宋庆龄1975年3月15日致廖梦醒信，《宋庆龄书信集》续编，第498页。

[21] 宋庆龄1945年10月13日致格雷斯信，《宋庆龄书信集》上册，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04页。

[22] 宋庆龄1947年致王安娜信，《宋庆龄书信集》续编，第84页。

[23] 宋庆龄1950年7月致王安娜信，《宋庆龄书信集》续编，第226页。

[24] 宋庆龄1980年10月22日致鲍先

生信，《宋庆龄书信集》下册，第907页。

[25] 宋庆龄1917年2月22日致珍妮信，《宋庆龄书信集》上册，第20页。

[26] 宋庆龄1950年1月17日致美国友人信，《宋庆龄书信选编》，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版，第112页。

[27] 宋庆龄1943年6月16日致弗农信，《宋庆龄书信集》上册，第233页。

[28] 宋庆龄1947年6月16日致贾瓦哈拉尔·尼赫鲁信，《宋庆龄书信选编》，第27页。

试论宋庆龄的文化品味

撰文 / 王宁宁

优雅、谦逊、温和、坚韧，宋庆龄极致地展现了东方女性的特点，这些性格特质，是她纯正、严肃的文化品位由内而外自然而然散发出来的，与她接受的民主教育，积淀的文化修养密不可分。本文主要借助宋庆龄与友人的通信和友人对宋庆龄的回忆文章，从生活品位、审美品位和价值品位三个方面展开，试图还原宋庆龄丰满鲜活的人生场景，研读宋庆龄健康高尚的文化品位。

一、生活品位

一个人的生活品味主要体现在物质生活质量中，宋庆龄在衣食住行方面从不追求奢侈，但是也绝不敷衍。她尊重时代风格，却不盲从时代，迷失自我。宋庆龄在着装、饮食等方面都有自己的看法，中西结合是最主要的特点。这源于宋庆龄的教育背景，她13岁赴美留学，在穿着风格、饮食习惯上不可避免带有西方色彩。

1. 着装偏好

宋庆龄因留学经历，有一段时间很喜爱欧式服装。嫁给孙中山后，宋庆龄的穿衣品位就完全中式化了，日常起居、出席各种活动，都主要穿上衣下裙的中

式服装。1925年至1949年期间，宋庆龄以穿旗袍为主。在解放后一些重要的场合，她也穿着旗袍出场。这些旗袍简洁流畅，婉约含蓄，颇能体现她优雅的仪态和高贵的气质。

宋庆龄在解放后所呈现的穿衣风格，很大程度上受着社会条件的制约。当时中国妇女宣扬的是去性别化的穿衣风格，不能穿花哨的衣料。宋庆龄虽无力改变，却也不太赞成。“我竭力向他们解释说，时尚和服饰在人们的生活中是很重要的。有一天，我国妇女也会脱下现在的制服，穿上更为女性化的服装。”^[1]宋庆龄一直强调服装多样化，是她崇尚生活情趣自由的价值观体现。

宋庆龄还穿过不少西式服装，像黑呢大衣、西装套裙等，这些服装都有一个特点，就是要能修饰身形^[2]，她在中年身体逐渐发福后，特别强调服装的这一特性。在给好友王安娜的信中，她提到：“我要做套衣服。记住我一定要修长的式样。”^[3]在当时服装款式并不多样的条件下，宋庆龄还自己动手设计服装，她设计的一条裙裤连邓颖超见了也非常推崇。“她很喜欢我在家里穿的衣服和

裤子，想建议我们妇女都这样穿。那种裤子很宽大，人站着时看去就像裙子，却有裤子的方便和优点。”^[4]那个以革命为时髦、劳动最光荣的时代，女性改穿裤子，宋庆龄却把裤子穿出裙子的样子，不能不叹服她在着装方面的独特智慧。^[5]

宋庆龄在会客和参加政务活动时，很注意服饰，以示对客人的尊重，但是在日常生活中她穿着非常简朴和整洁。可以说，宋庆龄的着装，一直是符合时代发展的，同时她又不盲从于时代，总是在社会允许的范围内做着自己的调整，因此，即便是在那个千篇一律的时代，宋庆龄的着装仍体现出强烈的个人特色，那就是注重细节，突显女性魅力。

2. 饮食习惯

宋庆龄的饮食习惯受中西两种文化的影响。在美国留学的经历让她养成了许多西方的用餐习惯，如使用分餐制。她还会做许多西式菜肴，比如用嫩玉米做法式素菜，柠檬泡芙做冰淇淋等等。黄油和奶酪是宋庆龄的最爱吃的食物。

宋庆龄的饮食习惯理所当然地会受到孙中山的影响。“她爱吃甜的食物像汤丸、粽子，这些饮食习惯许多是从孙中山先生那里学来的。”^[6]她的炒菜技术，也有一部分是跟孙中山所学。宋庆龄回忆说孙中山“长期过流浪生活，学会了炒菜煮饭，而且他是医生，懂营养，青椒（里）维他命C特别多，所以我常吃青椒；紫萝卜是我用盐渍的，不仅营养好，而且很爽口，是我喜欢吃的。”^[7]

她不仅注重口感，还非常关心食物的营养价值。在炎热的夏季，她嘱咐友人“用红枣和绿豆煮粥，味清香，可以消暑。”^[8]这些注重营养搭配的食物证明宋庆龄很注重养生之道。

宋庆龄喜爱烹饪，认为这也是一门艺术。她会请朋友来在厨房里试验菜谱，还会把中国烹饪书作为礼物送给外宾^[9]。碰到兴致高的时候，她还会亲手做菜招待客人。在一次留罗叔章等人吃饭时，她亲自做了爆炒牛肉丝给客人品尝。宋庆龄“饶有兴致地拿起菜刀，切好一盘细细的牛肉丝，然后又调好各种佐料，用热油爆炒，很快就起锅了”^[10]。她的厨艺相当不错，获得许多人的称赞。1964年女摄影家侯波陪宋庆龄访问锡兰，曾在昆明逗留了三十六天，宋庆龄每天中午都为她做一道菜，没有一次重样，她高超的技艺和所做菜肴的美味令侯波叫绝不已。^[11]作为一名国家领导人，宋庆龄丝毫没有架子，反而为工作人员亲自做菜，这种平易近人的态度让很多人折服。烹饪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加深了人与人之间的情感。

二、审美品味

在宋庆龄所处的时代，中国女子受过高等教育的很少，出国留学更是凤毛麟角。宋庆龄的父亲宋耀如具有深远的眼光，他将六个子女全部送出国门，到美国接受高等教育。宋庆龄得益于此，具有高于同一时代普通人的审美品位。宋庆龄在文字阅读和音乐欣赏方面都涉

猎甚广，她从这些领域汲取诸多营养，内心获得充分满足，从而更加精神百倍地投入到繁忙的工作中。

1. 文学素养

宋庆龄非常喜爱西洋文学，爱好莎士比亚、巴尔扎克的作品，在她给友人的信中，也能看出她的文学造诣非常之深。1942年6月宋庆龄在致王安娜的信中谈到：“我发现下周六是七月四日，美国人有庆祝活动，……‘巴克斯愿意去’，并将带一瓶好酒作为我的贺礼。”^[12]其中“巴克斯愿意去”引自查尔斯·狄更斯的小说《大卫·科波菲尔》，意思是“宋庆龄愿意去”。在1949年致王安娜的信中，她再一次提到了狄更斯的作品，“我现在觉得我像狄更斯的小说《圣诞欢歌》中的老吝啬鬼那样，四个孩子搂着我的脖子，把我的餐厅变成卧室。”^[13]这些文字和上海寓所至今保存的狄更斯的《匹克威克外传》、《远大前程》等著作，足以证明宋庆龄对这位作家的热爱。

宋庆龄读书的选择受孙中山影响颇大。在她与孙中山共同生活的岁月里，她的工作之一就是为他读科学著作，“如马克思、恩格斯和其他政治书和社会学的书。”^[14]在她的藏书目录中，有相当一部分涉及政治社会学的书籍。除此之外，精美的童书、神奇的科幻，宋庆龄也会有所触及。上海寓所保留着《鹅妈妈》、《彼得兔的故事》等精致的童书，这不仅与宋庆龄所从事的儿童事业有关，更因为她始终保持一颗纯真的童心。藏

书中还有一些科幻小说对宋庆龄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她在1973年致邓广殷的信中幽默地写到：“虽然还没到雨季，这里从新年之后就经常下雨。真是奇怪！我想可能跟外星人有关：他们试图告诉我们什么（你读科幻小说吗？）”^[15]这种发散联想真是让人忍俊不禁。

宋庆龄喜欢用英文写作，她熟练地用这种语言表达看法和意见。在为中国人民解放所经历的奔走呼号中，宋庆龄曾用英文发表了许多声明和呼吁。这些声明和呼吁非常激动人心，不仅说理雄辩，感情强烈，而且直截了当，切中问题要害，十分符合宋庆龄的性格特点。宋庆龄还会用诗歌这一文体来表达自己的感情，曾写下《无名烈士》、《一千万双手》等作品。宋庆龄所写的诗歌并不复杂，大部分都是直抒胸臆，感情真挚朴实，更有一种直指人心的力量。

2. 音乐爱好

宋庆龄自幼接受西方音乐教育，弹得一手好钢琴。在她工作闲暇之余，也会通过弹钢琴的方式来缓解压力，释放情绪。据她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忆，宋庆龄经常会在楼上办公室的钢琴旁，弹奏贝多芬交响曲，黄河大合唱等乐曲。^[16]宋庆龄钟爱海顿、柴可夫斯基等音乐家的创作，对歌剧、交响曲、协奏曲、奏鸣曲等各种表现形态的作品都很喜欢。通过不断的学习和鉴赏，宋庆龄对音乐形成了自己的欣赏力和感悟力。宋庆龄在上海的寓所保留有大量的唱片，其中

有很大一部分都属于古典音乐，像莫扎特的《田园曲》，贝多芬的《月光奏鸣曲》等等，这些音乐让宋庆龄保有内心的平静，是她的心灵家园。

宋庆龄特别喜爱电影插曲。以“华尔兹王”约翰·施特劳斯为主人公创作的电影《翠堤春晓》曾经风靡全球，其中有许多脍炙人口的插曲，如《当我们年轻的时候》，宋庆龄也深受该影片影响，请友人帮她购买相关唱片。她自己本身还藏有《维也纳森林圆舞曲》、《春之歌圆舞曲》、《风流寡妇圆舞曲》等唱片，足以证明对这位作曲家的喜爱。20世纪30年代，宋庆龄在柏林观看了斯登堡导演的电影《蓝色天使》，对她而言具有特殊的意义^[17]，以至于到了1951年，她仍托友人王安娜帮她寻找电影插曲的相关唱片。像女主角玛琳·黛德丽（即马琳·迪埃特里奇）演唱的《蓝色天使》、《重坠爱河》等歌曲，让她念念不忘，这些唱片让她“回忆起许多在柏林时的美好时光，那时我去看正在放映的那部电影，看电影里的玛琳和艾米尔·詹宁斯。”^[18]宋庆龄还恳请朋友帮她购买《啊，甜美神秘的生活》（出自电影《淘气的玛丽达》）、《我想过个白色的圣诞节》（出自电影《假日酒店》）等唱片，这些印有故事情节的音乐是宋庆龄回首往事，缅怀过去时光的最佳媒介。

三、价值品位

宋庆龄所接受的民主教育和所处的时代环境，让她对人生、对社会形成自

己的理解和判断，对自我的价值实现有清晰的认知。近代中国的历史是一部血泪史，国家的衰弱、国民的蒙昧，让宋庆龄立志要为民族解放奉献一生。不管遭到何种挫折，宋庆龄始终坚强乐观，她把自己的人生理想融入到国家、民族的命运中，并通过不懈努力，与人民一起迎来了新中国的解放。

1. 对待挫折坚强乐观

孙中山逝世对宋庆龄而言是人生极大的挫折，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她一定经历了可怕孤独的煎熬。“但是宋庆龄从来不让她承受的巨大损失影响到她的自主精神、她的乐观和她充满活力的幽默感。”^[19]正如她在给廖梦醒的信中所言：“你懂得，一旦我们所爱的人与我们诀别而去，那么相互爱得越深，我们所承受的悲痛也就更深沉。……但正像你所说，我们终有甜蜜和爱恋的记忆留在心间。”^[20]正是在与孙中山共同生活中所积累下来的甜蜜回忆，支撑她坚强地以独立的角色登上政治舞台，在历史的长河中留下了自己的浓墨重彩。

莫利哀路寓所是宋庆龄与孙中山共同生活过的地方，但是因为日军占领上海，房子年久失修，1945年宋庆龄回到上海时，此房已无法居住。“我想还是放弃算了，在住了这么多年之后！当然，我对它是有感情的，特别是它使我怀念那些曾同我欢乐相聚的亲爱的朋友们。但老是对一些已经消失的东西抓住不放，又有什么用呢！”^[21]这种豁达的人生态

度是宋庆龄的真性情，也是她独自走完人生的坚强精神核心。

在一个人生活的过程中，孤独是避免不了的情绪。如何度过枯燥乏味的生活，宋庆龄有自己的方式。“我喜欢看色彩，它们似乎能给生活增添欢乐的气氛。”^[22]除了养花、画画这些可以充分体会到色彩的活动，宋庆龄还有一个排遣寂寞的方式，就是织布，宋庆龄非常喜欢织布，并为此写了一本《业余爱好》的书。她说：“没有什么比这更能使人放松的了，因为它需要集中精力，所有的烦恼就都忘了。”^[23]人在忙碌时会忘记各种烦恼，建国后，宋庆龄的时间就被繁忙的国务活动所占据，在她健康状况不佳的状况下，她仍然坚持参加各种活动。“如果我能为我的国家作些贡献，我必须竭尽全力去做。”^[24]

2. 个人价值与人类理想的统一

宋庆龄认为，国家不分大小，都应有自主权，并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拥有更多的民主。虽然近代历史上中国饱受侵略，她仍然坚定地认为中国人同外国人完全平等。不管是受父亲的影响，还是对中华民族自身处境的警醒，在国外读书的数年，她对祖国一直保持高度关注。大学毕业后，她成为孙中山的秘书，做出了嫁给孙中山，追随孙中山踏上革命道路的决定。她在给好友阿莉的信中谈到：“婚姻生活的幸福不同于并大大超过处女时期的满足，特别是当幸福包含在使所有在你周围的人都能愉快地生活

的共同愿望中，这就足够了。”^[25]这不是狭隘的个人理想，而是一种大爱，是将个人的人生价值与人类理想统一起来的一种发自内心的幸福感。

对于中国革命所经历的诸多挫折，宋庆龄毫不灰心。“历史就是这样，没有什么是不经历苦难就可以创造出来的，不管是一个国家还是一个人。”^[26]大革命失败后，宋庆龄两次出走欧洲，寻求中国革命的出路。回国后，她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积极营救民主人士。抗战爆发后，她成立保卫中国同盟，为抗战募捐。抗战胜利后，她又把保卫中国同盟改组为中国福利基金会，继续支持上海儿童事业和解放区的国际和平医院。革命的道路并不会一帆风顺，也许漫长而艰险，“但是，让普通人进步，富裕、高尚、接受教育，始终是我们唯一的道路。”^[27]为了达到这一目标，仅靠一部分社会精英是不够的，宋庆龄将人民大众视为国家走向自强最重要的基础，“他们在经受压迫和赢得胜利这两方面都显示出的力量，使我对他们深感钦佩，也使我认识到，没有任何力量——不论是大自然的安排还是人的邪念——能阻止他们有朝一日完全驾驭自己的生活。”^[28]中国的统一与完整、人民的自由与解放、生活的富裕和进步，是宋庆龄毕生所追求的，她选择与中国共产党并肩作战，最终迎来了这一天的到来。

宋庆龄有自觉的文化品位意识，她所代表的是一种健康的、高尚的、与时

代相符的文化品位。今天文化品位已经成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事业和精神文明建设活动中积极、有益的构建性因素，坚持必要的文化品位取向，是“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必然要求。加强对宋庆龄文化品位的宣传正是这样一种有利的引导方式，它将促使普通民众了解宋庆龄，进而受其感染，形成以之为榜样的良性循环，也必将成为整个社会文化品味提高的助力。



[1] 宋庆龄 1951 年 10 月 11 日致王安娜信，《宋庆龄书信集》续编，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277 页。

[2] [5] 麦灵芝：《优雅·时尚——馆藏宋庆龄服饰展漫谈》，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馆刊，2013 年第 1 期。

[3] 宋庆龄 1951 年致王安娜信，《宋庆龄书信集》续编，第 284 页。

[4] 宋庆龄 1951 年 10 月 11 日致王安娜信，《宋庆龄书信集》续编，第 277 页。

[6] 林国才：《怀念宋庆龄婆婆》，原载《今日中国》（中文版）1993 年 1 月。转引自《回忆宋庆龄》，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 2013 年版，第 356 页。

[7] 李云：《党派我给宋庆龄当秘书》，原载《炎黄春秋》2001 年第 6 期。转引自《回忆宋庆龄》，第 453 页。

[8] 宋庆龄 1978 年 6 月 26 日致康克清信，《宋庆龄书信集》下册，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794 页。

[9] 宋庆龄 1956 年 9 月 17 日致爱泼斯坦信，《宋庆龄书信集》下册，第 508 页。

[10] 史慰慈：《我们的“林泰”宋庆龄》，原载《上海滩》2001 年第 5 期。转引自《回忆宋庆龄》，第 225 页。

[11] 侯波：《宋庆龄是中国妇女的骄傲》，原载权延赤著：《领袖泪》，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6 年 7 月版。转引自《回忆宋庆龄》，第 600 页。

[12] 宋庆龄 1942 年 6 月致王安娜信，《宋庆龄书信集》续编，第 15 页。

[13] 宋庆龄 1949 年致王安娜信，《宋庆龄书信集》续编，第 196 页。

[14] 宋庆龄：《我家和孙中山先生的关系》，载《党的文献》，1994 年第 5 期。转引自《宋耀如生平档案文献汇编》，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 2013 年版，第 132 页。

[15] 宋庆龄 1973 年 5 月 7 日致邓广殷信，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藏。

[16] 周和康：《风范传万世 光彩照人间》，原载《联合时报》1993 年 1 月 22 日。转引自《回忆宋庆龄》，第 733 页。

[17] 宋庆龄 1951 年 6 月 12 日致王安娜信，《宋庆龄书信集》续编，第 269 页。

[18] 宋庆龄 1951 年 6 月致王安娜信，《宋庆龄书信集》续编，第 270 页。

[19] 林达光：《她生命中最后的日子》，译自《中国建设》（英文版）1981 年 9 月“纪念宋庆龄特刊”。转引自《回忆宋庆龄》，第 347 页。

（下转 11 页）

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 社会教育工作的实践

撰文 / 宣教部

近年来，随着越来越多的“博物馆进校园”、“博物馆进课堂”的活动开展，我们欣喜地看到诸多博物馆发挥社会教育职能的有益探索。经过实践，我们认为，博物馆也应借鉴学校教育的方式，尝试开发系统化、系列化的教育活动，与学校建立长期有效的互动机制，将博物馆教育与学校教育有机衔接。上海宋庆龄故居的“宋庆龄班”系列活动就是这样一种尝试。

“宋庆龄班”是上海宋庆龄故居未成年人教育活动的品牌项目，这项活动始于2005年，由上海宋庆龄故居牵头，联合周边的南洋模范中学、市二中学、市三女中、华东模范中学等十三所中学，在每所学校命名一个“宋庆龄班”。创建“宋庆龄班”的目的在于整合博物馆的教育资源与学校的德育教育，通过命名仪式和各类主题活动，帮助同学们走近宋庆龄、了解宋庆龄、学习宋庆龄。2010年，我们对五年来“宋庆龄班”开展的各项教育活动进行全面分析和评估，

在广泛征询学校意见的基础上，推出了新版《“宋庆龄班”主题教育活动实施方案》。《方案》规范了每一届宋庆龄班的基本活动流程和具体操作形式，将“宋庆龄班”的各项工作纳入到一个有计划、有目的、可操作、可评估的规范体系中。通过“班旗”交接、主题宣讲、主题班会、主题实践和总结表彰等各类活动，实现仪式教育、主题教育、班会教育、实践教育和成果教育。

（一）仪式教育

时间为新学期开学后，形式为“宋庆龄班”命名仪式。每年开学后，“宋庆龄班”所在学校在本校遴选优秀班级，命名为新一届“宋庆龄班”，由上海宋庆龄故居为同学们进行授牌。通过命名仪式，让同学们获得自己成为“宋庆龄班”一分子的认同感和荣誉感。同时，由故居指派一位讲解员担任该“宋庆龄班”的课外辅导员，负责故居与“宋庆龄班”同学之间的日常联络和沟通。

（二）主题教育

时间为9—10月,形式为宣讲和参观。先由“宋庆龄班”的课外辅导员到“宋庆龄班”进行一次主题宣讲,介绍宋庆龄的生平事迹,再由学校组织同学们到上海宋庆龄故居实地参观,加深印象。通过这两次学习,让“宋庆龄班”同学们对宋庆龄有基本的了解,对这位伟人产生敬意。

(三) 班会教育

第一次为11—12月,第二次为次年4—5月,形式为主题班会。第一次班会由“宋庆龄班”的课外辅导员围绕宋庆龄的生平事迹和思想品德确定主题,要求同学们自己收集相关材料,针对主题自由发言,通过发言、问答和辩论,再由课外辅导员进行适当的引导和总结,让同学们对宋庆龄有更深的了解。

第二次班会由“宋庆龄班”同学们自行组织,鼓励同学们通过演讲、朗诵、歌舞、情景剧等丰富多彩的形式表达自己对宋庆龄的敬意和参加“宋庆龄班”活动的感悟。

(四) 实践教育

这是“宋庆龄班”系列活动的重点所在,时间为次年寒假和暑假,形式为志愿服务和主题活动。每年寒假,故居将从“宋庆龄班”中选拔部分优秀同学来到故居担任志愿者,经过严格的招募、培训和考核程序,脱颖而出的同学们将来到故居,为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提供中、英文的讲解服务。在锻炼自身能力的同时,也对宋庆龄的人生道路有了更

深的理解。

每年暑假,上海宋庆龄故居都会结合社会热点,与“宋庆龄班”的同学们共同策划一个大型主题活动,既是弘扬伟人精神,同时也让同学们有机会亲身实践和展示一年来的学习成果。自2008年起,“宋庆龄班”先后开展了“宋庆龄班——环保节约、奉献爱心”公益活动(2008年)、“追寻宋庆龄的美德”中学生有奖征文竞赛(2009年)、“蓝天下的至爱”爱心义卖活动(2010年)、纪念宋庆龄逝世三十周年主题情景剧展演活动(2011年)、“寻访宋庆龄在上海的足迹”主题摄影活动(2012年)和“宋庆龄在上海”主题巡展活动(2013年)。

(五) 成果教育

时间为次年的8月,形式为总结表彰会。在暑假结束前,上海宋庆龄故居将结合当年度的主题活动,召集“宋庆龄班”同学们欢聚在一起,对在年度主题活动和志愿者工作中表现优秀的同学给予表彰和奖励,与同学们共话一年来的成长和心得,留下对“宋庆龄班”的美好回忆。

相较于其它社会教育活动,“宋庆龄班”的特别之处在于,它建立了一整套系统化的社会教育活动方案,通过一年左右的时间,8到10次的活动,“宋庆龄班”的同学们将由浅入深,对宋庆龄的生平事迹和高尚品格有全面的了解,并经历感性认识——理性认识——实践体悟——内化品德的过程,最终实现思

想道德教育的目标。为了配合“宋庆龄班”的教育活动,大多数学校也会将当年的德育工作的主题与“学习宋庆龄”结合起来,从而实现博物馆社会教育与学校德育工作的“无缝衔接”。

开放式、互动式、情境式的教育方式是博物馆社会教育区别于学校教育的重要特征,也是博物馆社会教育的吸引力所在。如今的博物馆越来越注重观众的互动体验,许多博物馆在陈列设计阶段就有意采用“露置陈列”的方式,在陈列中加入让观众可以动手操作的展项,拉近观众与展品的距离。在博物馆的社会教育活动中,互动性也是首先要考虑的要素,不过在大多数时候,我们往往强调的是博物馆社教人员与教育对象之间的互动,即“教”与“学”的互动,由社教人员通过提问、对话等方式引导学习。然而在笔者看来,观众之间的互动其实同样重要。在现代教育学的视野中,除了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同伴教育的作用同样不可忽视。博物馆可以通过设计相应的教育活动,通过游戏、竞赛等形式,让亲子之间、同伴之间展开互动,从而让教育的内涵更加丰富,教育的形式更为多样,而教育效果也随之提升。

(一) 亲子互动

家长带着孩子来到博物馆参观,往往正是出于教育的目的,但是在大多数时候,家长并不具备就博物馆的展品引导孩子进行学习的能力,这个时候,专



▲ “宋庆龄和可爱的家”亲子互动手册目录

为带着孩子的家长设计的亲子活动项目就有了用武之地。上海宋庆龄故居针对前来参观的未成年人家庭精心设计了一项亲子互动活动:“宋庆龄和可爱的家”。每个前来故居参观的未成年人家庭均可免费在游客服务中心领取一本亲子活动手册。在参观的过程中,未成年人与家长可以按照手册的指引一起完成“寻宝、贴纸”、“找茬”、“连连看”、“填色”等一系列亲子游戏,其中既有合作任务,又有竞争环节,趣味十足,全部完成后还可获得奖励,加盖我馆特有的3款亲子活动纪念章。这项活动大大激发了未成年人的学习兴趣,此时不再是家长拖着孩子要他看这个看那个,而是孩子拖着家长一起完成各项任务。同时,活动也拉近了家长与孩子的距离,让家长得以观察孩子的兴趣所在,从而感悟正确的教育方法。

(二) 同伴互动

同伴教育是指具有相同背景、相似经历和相似年龄的伙伴,共同分享信息、知识和观念,相互传递思想、情感,以



▲ “宋庆龄故居奇妙之旅”桌面游戏

唤起感情上的共鸣。多年来，教育工作者常常习惯于强调自身的主导作用，而忽视或有意降低同伴教育的作用，事实上，通过恰当的引导，同伴教育的效果往往更为明显。“宋庆龄故居奇妙之旅”活动就是上海宋庆龄故居专为结伴到故居参观的未成年人设计的一项活动。它借鉴了当下非常流行的桌面卡牌游戏的形式，以我馆的参观路线为游戏地图，共设6道关卡，以宋庆龄的生平事迹和相关历史知识为任务，前来参观的未成年人可以与同伴共同组队开展竞赛，通过完成随机抽取的任务以及利用辅助游戏的道具卡一路过关斩将直至终点，完成游戏的各小组最后根据排名可获得相应奖品作为奖励。该活动的特点在于游戏的过程既有合作又有竞争，小组成员之间通过相互鼓励、相互帮助，合力完成各项任务；小组之间则通过相互竞争，在比拼脑力的同时，也相互促进，相互

学习，从而共同进步、共同成长。

随着时代的进步，社会对博物馆有着越来越高的期待和要求，人们不再满足于看展览和听讲解，人们希望在博物馆得到更好的参观体验，也希望在博物馆得到一流的教育服务，这就对博物馆的社会教育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认为，作为博物馆的社教工作者，必须勇于尝试和探索，既要了解观众的需求，更要开拓自身的思路；既要在理论上深入思考研究，更要在实践上不断开拓创新，保持博物馆社会教育工作的活力，让观众体验博物馆社会教育的魅力，用博物馆社会教育为中华文化的发展和繁荣助力。



[1] 北京博物馆学会编：《博物馆社会教育》，北京燕山出版社2006年版。

[2] 杨丹丹、闫宏斌主编：《博物馆教育新视阈》，文物出版社2009年版。

[3] 闫宏斌、杨丹丹主编：《博物馆与儿童教育》，文物出版社2013年版。

[4] 苏东海：《博物馆的沉思》，文物出版社1998年版。

[5] 段勇：《当代美国博物馆》，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

“指尖上的故居” ——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 微信平台运营小记

撰文 / 吴颖嫣

随着信息科技的迅猛发展，新媒体异军突起，2013年，我馆先后开通了官方微博（新浪）、微信公众帐号。今年7月起，笔者开始负责管理我馆的官方微信。

起初我们只是模式化的定期在微信平台发布我馆的各类活动信息，回答网友在平台上的留言提问。但是时间久了，却发现我们通过微信平台推送的内容，粉丝的阅读量和点击率却寥寥无几。于是如何更好地利用好官方微信这个新媒体平台开展宣传教育工作，扩大受众范围，成为了我们思考的问题。

换位思考 提升平台体验度

究竟观众希望通过官方微信得到怎样的资讯？他们又希望一个官方微信平台具备怎样的功能呢？我们开始有意识的去关注其他一些博物馆、纪念馆的官方微信，以观众的角度去观察他们发送的内容中，哪些是自己比较感兴趣的，

同时留意他们的界面设置、推送内容和相关服务，希望从中可以得到些启示。

一段时间后，笔者意识到，每一位微信平台的粉丝，所希望的都不是被动的接受官方微信所推送的内容，他们更希望和微信平台有一定的互动。就以笔者本人举例，当我对别的博物馆、纪念馆微信留言提问后，总希望能够尽快得到答复，而不是长时间没有回复。但有时由于岗位关系，可能无法做到第一时间回复。针对这样的情况，我们设置了微信平台的自定义菜单功能。将一些常见的游客问题，如故居的交通指南、联系方式、近期活动内容事先编辑好，制作成素材，而粉丝只要通过点击平台下方的菜单界面，就可以收到对应的回复。

而且我们还发现不少博物馆都推出了微信导览服务，也就是在原有的讲解员服务基础上，为观众提供更为多元的

服务。

于是我们便开始着手上传资料，制作微信语音导览，但是微信语音的内容有其特殊性，因微信每条语音的时间不能超过1分钟，所以这就需要将原本的录制的语音讲解文件进行重新编辑，剪裁成合适的长短。

在部门同事的共同努力下，2014年7月我馆微信平台正式启用语音导览服务，微信导览一经推出，便受到了观众们的广泛好评。这种新颖方便的讲解形式，使观众不仅可以获得与现场讲解员相同的讲解效果，更提升了观众的参观自由度，几乎等于观众在参观故居时，邀请了一名专业的私人讲解员全程陪伴，随时根据自己的需求进行专业讲解。

而在推出微信语音导览的同时，我们还开展了“我是小小解说员”志愿服务系列活动，让“宋庆龄班”的志愿者来录制故居部分文物背后的故事。我们计划今后陆续将本馆的特色展品也制作成微信导览，使观众不单单在故居院内里，就算在家中、在外地、甚至在海外，只要对故居的某件物文物感兴趣，那么就可以随时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收听和收看到关于它的详细介绍。

开展活动 调动粉丝活跃度

微信和微博在性质上其实是一样的，都属于社交性新媒体。而在这样的平台上最重要的就是与粉丝进行交流和互动。所以官方微信需要不时策划微信粉丝互

动活动，通过活动来提升我馆官方微信的人气，并带动微信粉丝数量的增加。

今年我馆微信平台先后开展了“忆伟人 寄思念——宋故居清明节特别活动”、“您提问 我赠书——微信粉丝活动”等一系列“线上线下”互动。

其中“忆伟人 寄思念——宋故居清明节特别活动”，是在清明节期间，故居官方微博微信共同开展的一项特别活动，粉丝们在活动期间只需将自己对宋庆龄的缅怀之情编辑成文字，在微信公众平台留言，或是在微博上@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即可凭微博或微信留言截图，在我馆游客服务中心领取我馆自制的精美书签一枚。

而“您提问 我赠书——微信粉丝活动”则是微信平台的独立活动，观众只需将在参观过程中遇到的关于陈展或宋庆龄的任何问题通过微信平台留言，一旦观众的问题被采纳，便可获赠我馆出版的《宋庆龄来往书信选集》一本。

几项活动的顺利开展，不仅大大提高了我馆微信平台的活跃度和影响力，也为今后开展相关活动累计了有益的经验。

今后我馆在新媒体平台的运营过程中，将更积极地策划各类微信活动，并加强与网友们的互动交流，以最准确的内容、最生动的语言、最真诚的态度向网友们介绍有关宋庆龄的方方面面及我馆的新鲜资讯和活动，以期取得更好的宣传效果。

“孙中山宋庆龄印章珍藏展” 办展心得

撰文 / 水草

“方寸之间 历史流淌——孙中山宋庆龄印章珍藏展”于2014年6月18日在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开幕。该展展出了30余枚馆藏珍贵印章，包括数枚首次公开展出的印章以及三枚已被评定为国家一级文物的印章。展览让观众们在欣赏印章本身的同时，还了解到了它们背后所流淌的历史。该展开幕后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反响，很多专业人士都对展览的内容和形式予以了充分肯定。

笔者负责本次展览的内容设计，并全程跟进形式设计及施工布展。由于此次的选题为印章，专业性强，且是临展厅改造后的首个展览，所以大家都寄予了很大的期望，这也无形中给展览的筹备增加了压力和难度。作为主要执行者，笔者将自己的办展心得与大家分享。

一、认真酝酿陈列大纲，广泛听取意见。

要办好一个展览，陈列大纲是根本；要写好一份陈列大纲，前期则必须做大

量“功课”。从去年下半年开始，笔者着手进行印章展陈列大纲的撰写。因为展览展品限定为馆藏文物，因此无需考虑文物征集的环节，节约了很多时间和精力。笔者要决定的是选取哪些展品，如何发掘这些展品的背景，怎样用一根主线把这些展品串起来。在馆老领导刘世襄的指导下，笔者从阅读《玺印源流》等专业书籍开始，逐步了解、亲近印章。为更好地把握馆藏印章的艺术性，我们又邀请有关专家对印章的材质、品质进行了鉴定。经过多番考量，最终决定以揭示印章背后所流淌的历史作为展览的主线，更为符合我们弘扬孙中山、宋庆龄精神的宣传目的。

按照既定的主线，笔者开始挖掘每一枚印章背后的历史，撰写陈列大纲。大纲初稿完成后，馆里专门组织人员召开会议进行讨论，大家都充分发表意见，各种想法的碰撞给笔者提供了很多新的思路，在此基础上，又反复琢磨、修改。

最后决定把介绍印章所涉及的人物说明，背景描述等大量文字都纳入二维码中，仅留一些与印章本身密切相关的文字、图片放在展览的版面上。

二、展览设计与展厅改造统筹规划。

本次印章展之前先进行临展厅的翻新改造工程。馆里非常重视这次改造，专门请设计公司的资深设计师进行室内设计。设计方案形成后召开的讨论会不下十次，展柜形式，展线走向，隔断花式、高低等等都一再讨论和修改。我们花了两个多月的时间在沟通、修改设计方案上，当然最终的方案基本达到了我们的要求。之后印章展的实际布置证明，改造工程的“精雕细琢”是很有必要的，当时决定的一些细节，如使用通柜、制作铁艺隔断等等，在展览中的实际效果都很理想。

因为展厅的改造和印章展的设计是连续进行的，所以我们请了同一家设计公司，这样的好处是设计师会有一个统筹安排，在设计展厅的同时就可以对展览的形式有一个初步的构想，而且设计师手头有现成的展厅图纸，可以直接按照图纸上的尺寸制作展览版面，节约了时间。

三、直接介入形式设计，一丝不苟做校对。

本次展览的形式设计委托给了设计公司，但为了确保版面效果，除了通过网络反复沟通，我们还多次赴设计与设计师直接沟通。每张图片放哪里，

缩放多少，居中还是左对齐，几乎是手把手地让设计师一一修改，改完一稿看效果，再继续改，直至符合我们的要求。笔者相信，如果我们没有这么“亲力亲为”，设计师很可能就会比较随意地对待我们的展览，不仅效果不好，还会犯一些低级错误。在形式设计的过程中，也遇到某一部分大纲内容过多或过少，导致版面不好看的情况。这个时候就只好“忍痛割爱”做减法或“冥思苦想”做加法。形式是为内容服务的，但有时候内容也必须服从于形式。

由于设计师不熟悉大纲内容，设计稿上很有可能出现漏字、错字、图片错误、内容放错等等问题，何况本次展览版面改动非常多，前后改了有近十稿，出现错误的几率也就更大。为避免产生这种不应该有的错误，笔者在版面校对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抱着坚决不能犯低级错误的决心强迫自己静下心来一个字一个字地检查，这样的校对一直持续到最终版面上墙、画册付印。

四、尝试运用新媒体、衍生品。

在本次展览中，我们运用了新媒体手段——二维码，这是之前馆里的临时展览都没有尝试过的。事实证明，二维码的使用极大地延伸了展览所蕴含的信息量，还使版面显得更加简洁干净。在二维码的摆放方式上，我们也动了些脑筋，直接将二维码贴在说明牌上，既不影响版面又不突兀，而且扫描起来也很方便。负责生成二维码的同事将二维码

内容直接挂在了我们故居的网站上，还配上了对应的图片，效果很好。

出于种种原因，此前馆里举办临时展览，都没有制作配套画册，这次的印章展弥补了这个缺憾。虽然这只是一本小小的画册，但我们也倾注了极大的心血，跟对待展览版面一样，让设计师按照我们的要求逐张图片调整。笔者认为，将来办展如果时间和经费有余地的话，完全可以把配套画册制作得更加精美、高端一些，还可以制作一些单页或折页供游客免费取阅，如果能根据展览主题再同步推出一些有特色的纪念品就更好。

五、勇于创新，印章的陈列方式精益求精。

不论办什么展览，事先考虑得再详尽，最后布展的时候总会有突发状况。这次的印章展也不例外。原以为摆放几枚印章是最方便不过的事情，半天时间绰绰有余。结果摆好印章调试灯光时，问题出现了。镜面反射出来的印章印面总有些暗淡，无论如何打光都没办法彻底照亮，虽能看清但看得不舒服。施工人员多番试验发现只有从底部打光才有可能照亮印面，但这是个大工程，必须把所有积木搬开，重新布线、钻洞、穿线，而此时离展览开幕只剩三天时间。时间越紧必须越快做决定，到底是留下遗憾还是精益求精，我们认为印章展最重要的就是让观众看印面，如果印面看不清展览就不算成功，所以必须改。开展前两天，重新布线工程抓紧进行的同

时，我们开始布展，经过调试，这次印面终于被彻底照亮，而且看得极为清楚。笔者此前参观过的很多大型博物馆、纪念馆都没有解决的问题，在我们这个小小的展览里得到了彻底的解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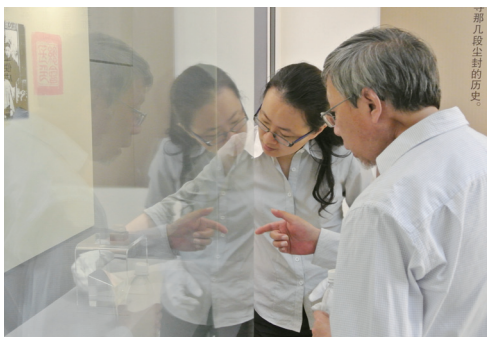
当然，在办展过程中，难免也有很多不顺和曲折，这些问题是我们应该在今后的工作中引以为鉴的。

一、展览陈列大纲在形式设计前定稿，避免大幅改动。

这次印章展的时间跨度很长，去年下半年笔者专注于展览的内容设计，而今年上半年则必须考虑更多事务性的工作，譬如商谈预算、审定合同，又如拍摄展品照片、对设计公司的设计方案提意见、校对设计稿上的文字等等。显然已经没有大块的时间和精力再回头去重新琢磨文字内容，换言之，去年定稿的大纲应该是得到大家认可的最终稿，不应再作大幅改动。设计公司设计好的版面内容只是供校对所用，不是为了重新修改文字内容。当然，前文已述，受限於版面，个别字句微调是不可避免的，但整体内容确应事先定稿，局部修改很有可能与当初撰写大纲时的行文风格不符合，而且还会影响展览进程。这是我们今后做展览应该尽量避免的。

二、充分考虑各项可能存在的导致工期延迟的因素。

这次展览原本可以提早几天完工，但因为各种原因，一直拖到了最后一天。设计阶段的精益求精、反复修改是原因



▲ 布展现场

之一，但布展过程中的突发状况则更值得我们注意。

这次展板使用的是6毫米KT板数码写真，布展按照原定计划开始，不料施工人员在板背后涂抹胶水后一小时，KT板正面即开始严重起壳，估计是因为这种板密度太低，又太薄。第二次换来了质量较好的雪弗板，但喷绘公司居然犯了低级错误，把颜色搞错，而且不同的板之间还有色差。第三次，为降低成本，设计公司还是做了原定的KT板，这次终于没有出错，可以上墙了。但是，两次返工浪费了足足三天的时间。如果说KT板和胶水起化学反应是难以预料的，那么版面颜色出错则完全是可以避免的。因为此前这家设计公司从未出过这种错，所以笔者也没有在意，没有督促他们事先去喷绘的地方对色。有了这次的教训今后应该牢记，设计公司很可能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负责，任何时候都必须注意督促他们，不能过分依赖。

三、认真对待每个环节，留足修改

和弥补的时间。

如前文所述，这次展览我们将二维码印在了说明牌上。说明牌送来时，笔者立刻去试验二维码是否能扫描出内容，为确保不同手机都能正常使用还叫了别的同事一起扫描，结果很正常。万万没有预想到的是，几天后实地布展时，这些二维码居然一个都扫不出来了，再仔细一看，印在亚克力说明牌上的二维码的墨迹竟已略有晕开，没有刚送来时那么清晰了。这一点晕开对文字来说没有任何影响，但对于需要手机识别的二维码来说则是“致命”的，当然扫不出来。这时候再重新制做说明牌时间很赶，关键是做好了很有可能还是当时扫得出几天以后就又扫不出了。最后，领导让我们索性采取最简单的方法弥补，把二维码打印在纸上，然后剪下来贴在说明牌上原来的位置。实际效果非常不错，扫描响应非常迅速，而且隔着展柜玻璃也根本看不出是用纸贴上去的。

做印章展应该让观众看到每个印章钤出来的印面是什么样子。原以为只要按照印章尺寸把印面喷印在板上即可，但实际操作时又出现问题。我们发现，设计公司拿来的喷绘出来的印面每一个都比印章的实际印面大。这是因为他们在量印面尺寸的时候，都是用卷尺卡着印章的外边缘量的，按照这样的尺寸打印肯定比实际钤出来的印面大一圈。而要完全照着实际钤出的印面打印是非常难把握的，甚至要拿着印章一个个比



▲ 工作现场

对，时间上根本不允许。最后我们还是采用了特殊办法，直接将故居早年出版的《宋庆龄藏印》里的印面剪下来，贴在亚克力板上，因为《藏印》里的印面都是以原印钤拓的，是最准确的尺寸。实际效果也非常好，甚至比直接喷制在亚克力板上的效果更好，清晰而又不失古朴。

有赖于老领导的丰富经验，这两个原本非常棘手的突发状况利用特殊手段

完美解决了，但这不得不引起我们的警惕。在这次的展览上问题可以这样解决，但以后换了别的展览或许就不能这么做，如果没有临时补救的方法该怎么办？所以吸取教训是必须的，要知道，设计公司不是万能的，有时候甚至是很不可信任的，关键时刻还是得我们自己来想解决方案，如果尚未积累到那么强的临场应变能力就还得“以勤补拙”，任何事都不能想得过于简单，要考虑周全，反复检查，最重要的是，必须留下充足的余量来修改和弥补。

让我们辛苦忙碌了近一年的印章展最终成功举办，笔者甚感欣慰，这是全馆同事集体努力的结果。当然，限于预算，展览中还是有一些细节没能做到一步到位，例如前言和结束语，没有亮度合适的射灯打光，又如展柜内的温湿度调节系统，尚未安装。相信今后这些问题都能根据预算情况逐步解决。



◀ 布置好的展厅

“深情厚谊——宋庆龄与周恩来、邓颖超的交往”策展纪实

撰文 / 花婆婆

一、展览主题和章节划分

去年我馆确定与天津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交流办展的意向后，一直在考虑做一个什么样的展览。以往的外出巡展均是以宋庆龄主体陈列为主，再增加部分人物交往内容的方式。经过搜集资料，我们发现在党和国家高层领导人中，宋庆龄与周恩来、邓颖超的交往是非常密切的，不管是在国家政务活动的层面上，还是生活交往的小事中，因此我们立意重新创作一个以三人的友谊为主线新展览。宋庆龄与周恩来、邓颖超相识于20世纪20年代，后来在50年的岁月里结下了风雨同舟的情谊。在他们交往的过程中，留下了大量见证他们友情的文物，我们希望通过此次展览，将双方相关的展品都拿出来，给观众最有力的实证。最终我们确立了“深情厚谊——宋庆龄与周恩来、邓颖超的交往”这一主题，用以连接彼此的共同点。

整个展览大纲经过多次修改后，最后确定分为五个部分，以时间为主轴，

契合他们在各个时期合作的重点，辅助以相应的文物，进行渲染展示。第一部分为“精诚奋斗、救国图强”，主要介绍他们相识及之后在抗战洪流中所作的贡献；第二部分为“肝胆相照、共商大计”，该部分主要展示抗战胜利后宋庆龄继续援助周邓身后的解放区，支援解放战争及毛泽东、周恩来邀请她参加北上建国的始末；第三部分为“共商国是、擘划未来”，该部分主要展示新中国成立后，作为国家领导人，宋庆龄和周恩来、邓颖超在政务上的合作，以及宋庆龄改组中国福利会时周恩来给予的关心和支持；第四单元为“拓展外交、增进友谊”，这部分主要展示建国初，为了给新中国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宋庆龄、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积极出访国外，会见外宾还有对外刊物《中国建设》杂志的创立和发展；第五单元为“革命情谊、万代楷模”，这部分主要展示他们彼此在日常生活中的关心和逝世给双方留下的创伤。这五个部分时间跨度大，基本

涵盖了他们交往的各个层面。

二、文物和图片的选定

在这次展览中，我们深入挖掘馆藏，天津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也为此次展览提供了一些档案和史料，使得展览在内容上更加充实。此次展览有些文物是在国内首次展出，以前我们可能在文献史料中已经得悉了这些内容，但是作为实物的文物，却是首次和观众见面。

1. 两份珍贵的文稿

周恩来、邓颖超二人与宋庆龄初次会面的时间并没有很清晰的史料进行界定。在他们撰写的文章中，可以捕捉到关于他们相遇的大概时间。在这次的展览中，展出了两份珍贵的手稿。一份是1977年1月，宋庆龄在周恩来逝世一周年所撰写的《怀念周恩来总理》手稿，全文共5页，收录在《宋庆龄选集》下册中。我们将手稿放在了本次展览的第一部分，在这篇文章中，宋庆龄提到了她第一次见到周恩来的感受：“在20年代中期，我在广州第一次见到了周恩来。他当时很年轻，但已经俨然是一位革命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多才多艺、久经锻炼的领导人了。”1924年6月16日黄埔军校开学，宋庆龄陪同孙中山到校参加盛典。周恩来到黄埔军校工作后，曾特邀宋庆龄到校讲演，对师生进行革命教育。宋庆龄的讲演，给周恩来留下了很深印象。宋庆龄、周恩来二人相识于国民大革命的风云际会中，他们共同

为国为民的追求为以后长达半个世纪的交谊奠定了基础。

另一份珍贵的文稿是邓颖超撰写的《向宋庆龄同志致崇高的敬礼》手稿。邓颖超对孙中山和宋庆龄非常敬仰。1924年12月，孙中山偕宋庆龄北上路过天津，邓颖超等天津五十多个工商学和妇女界代表欢迎他们，她第一次见到了孙中山和宋庆龄。她在手稿中记载了她见到孙宋的心情：“记得一九二四年冬，你和孙中山先生北上路过天津。你们出现在轮船的甲板上，同欢迎的群众见面。我在欢迎行列中，看到为推翻清朝帝制，为中国独立、自由、民主而奋斗不息的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坚定沉着，虽显得年迈，面带病容，仍然热情地向欢迎的人群挥帽致意，同时看到亭亭玉立在孙先生右侧的你。你那样年轻、美貌、端庄、安详而又有明确的革命信念。你，一位青年革命女战士的形象，从那时就深深印入我的脑际，至今仍然清晰如初。”此次由周邓馆提供展出的《向宋庆龄同志致崇高的敬礼》手稿，共9页，文中邓颖超深情回忆了这些与宋庆龄交往的珍贵历史片段。邓颖超在文章中还提到在抗战时宋庆龄对她的帮助，十分感人。邓颖超是共产党与宋庆龄合作的重要中间人，与宋庆龄交往颇多，是非常亲密的朋友。

2. 一些珍贵的照片

在此次展出中，照片是展览的主体。在一些我们非常熟悉的照片中，有一张

很特别，是一张周恩来和邓颖超的合影。这是在1946年5月，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到达南京，他和邓颖超在南京中共代表团驻地梅园新村30号院内拍摄的，当时拍摄了一组照片，上海宋庆龄故居也保存有这样一张相似角度二人的半身合影，据笔者推测是周邓二人送给宋庆龄的。

1949年8月，在毛泽东、周恩来的邀请下，在邓颖超、廖梦醒的陪同下，宋庆龄抵达北京，参加新中国的筹备工作。9月21-30日，她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并在会上作为特邀代表发表讲话，我们这次展出了一张她发表讲话的照片、周恩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作报告的照片以及邓颖超代表全国民主妇联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发言的照片，这一组照片十分难得，见证了他们在同一个舞台上齐心协力，进入为新中国奋斗的历史时期。

1981年5月29日晚20时18分，宋庆龄因病医治无效逝世，得知宋庆龄不幸逝世的噩耗后，党和国家领导人立即赶往宋庆龄寓所，向其遗体致哀。此次展览首次展出了宋庆龄病重期间，邓小平、邓颖超在北京宋宅临时灵堂向宋庆龄遗体告别的照片。1981年6月4日，邓颖超亲自将宋庆龄的骨灰从北京移送至上海，当宋庆龄的骨灰盒放入大理石墓埕后，邓颖超悲伤地将她生前喜爱的黄色香石竹花放在她的墓前，我们展出的

最后一张照片记录了这一送别的时刻。他们的友谊在此戛然而止，剩下的只余思念。

3. 几封珍贵的书信

1946年7月23日，宋庆龄发表了关于《促成组织联合政府并呼吁美国人民制止他们的政府在军事上援助国民党的声明》，为了表示对宋庆龄的支持，邓颖超转呈了解放区妇联会致孙夫人电，对她停止内战的呼吁表示衷心拥护。该信是为数不多的早期邓颖超与宋庆龄的通信，是两位在共同目标下的同声响应。

1952年12月，宋庆龄率中国代表团赴维也纳出席世界人民和平大会。在这次大会上，她发表了《人民能够扭转局势一文》，就修改大会发言稿11月30日和12月4日周恩来两次给宋庆龄的信，显示了二人之间亲密的友情。周恩来不止一次帮助宋庆龄修改稿件，周邓馆提供的这两份是比较有代表性的，一是周恩来亲笔书写的，二是这两封书信表现了周恩来对宋庆龄在维也纳开会的支持。

建国后，周恩来、邓颖超与宋庆龄在日常生活中的交往增多，他们之间开始有了通信，这些珍贵的书信里，这些生活中的往来虽然没有国家大事，但却展示了她们之间浓浓的友情。宋庆龄与邓颖超同为女性，二人交流起来更加便利。展览一共展出了三封他们的亲笔书信，一封是1953年2月12日周恩来、邓颖超写给宋庆龄的，告以因故不能前来送行，特派人送短信一封及食品若干，并祝宋庆龄春节快乐。这封信可以表明

周恩来邓颖超是经常接送宋庆龄的，这对工作十分忙碌的他们是非常不容易的。宋庆龄因住在上海的地利之便，经常给周恩来邓颖超赠送一些南方特产，在1963年1月4日邓颖超给宋庆龄的信中可以看出。信中表达了对宋庆龄身体的挂念，并送上百合、苹果等礼物，希望宋庆龄笑纳。邓颖超在信中还对宋庆龄多次赠与鲜美的螃蟹表示感谢，说明自己与周恩来因去年过于疲劳，在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息调整后已有好转，请宋庆龄放心。在文化大革命期间，1968年10月20日，宋庆龄致信邓颖超，表示自己在国庆典礼时看到她非常高兴，并送给她一双鞋子。为了怕邓颖超过于劳累，还请她不要回电或回信。这些贴心的家常话让我们感受到她们之间深深的情谊。

三、展线设计与展厅开放

此次展览在天津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举行，本着方便的原则，设计和施工我们请对方进行操作。因为时间很紧，对方场地很大，约有800平方米。因此并未采用在一张版面多张图片组合的排版方式，而是把精选出的82张图片放大，一张做一个展板，布置出一个展线清晰的展览，另外准备了40件文稿、手迹等文献和实物放在通柜中展出。

此次展览从8月28日至9月26日，共约有18万人参观。展览当天，天津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康金凤馆长等领导与我馆徐世芳书记和前来参观的观众一起



▲ 展厅



▲ 康金凤馆长陪同徐士芳书记参观

在讲解员的导览下参观，通过讲解员的讲解，大家对三人之间的交往的细节有了一定的了解，对他们之间感人至深的友情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天津日报》、《今晚报》等媒体对展览进行了报道。在此之前，关于宋庆龄的展览还从未在天津展出过，天津的市民也不太了解宋庆龄。通过这次的展览，不仅让他们认识了宋庆龄，直观地感受到宋庆龄与周恩来、邓颖超三人之间深厚的友情，还加强了我馆与周邓馆之间的馆际交流，丰富了彼此的文物资料，进一步加深了两馆的友谊，是一次卓有成效的展览。

孙中山宋庆龄印章漫谈

撰文 / 宫洁菁

古书有云：“人随时往，心思手泽，后岂易见？凡有遗存，固宜以异宝目之也。至于玺印为用，专以文字较优他玩。幸得留于后世，安可忽而置之？”大意为：印章作为实用之物，因其留存有文字，而较其他玩好之物更有价值，记载着前人思想和手泽的如此重要的印章，既然留存了下来，就不可不珍视。

确实，印章自古至今都是信用的证明和权利的象征，我国三千年的印章史堪称一部浓缩的人类文明发展史。印章的历史价值是不容忽视的。名人印章是印章中的一类，它是反映名人生活、工作的重要证物，意义非凡。

革命伟人孙中山、宋庆龄的一生中也曾使用过大量印章，主要分为两类，一类为与两人所从事的革命活动密不可分的官方印信，如“中华革命党本部之印”、“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之印”、“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主席之印”等；另一类为反映两人审美情趣及人际交往的

私人藏印，如“孙文之印”、“孙文藏书”、“孙宋庆龄”等。

本文拟就其中几枚形制比较特殊的私人印信作一个介绍。

艺术价值丰富的“孙文之印”

孙中山的私人藏印材质不同、形状各异，摆放在一起委实妙趣横生、夺人眼球。这些印章多被用于签发文件或题词的落款盖章。

“孙文之印 逸仙长寿”（见图版一）是一组对印，双狮钮，其石质经鉴定为寿山石中的芙蓉石。对印的边款分别为“民国五年十二月陈融谨篆”、“颀厂”，可知此印为1916年陈融^[1]刻制后赠与孙中山的。孙中山对他的革命同志陈融所刻制的这对印章十分喜爱，经常使用其中的“孙文之印”在自己的题词后盖章。如题赠给黎仲实的“博爱”横幅，题赠给陈伯陶的“天下为公”横幅，题赠给上海精益眼镜公司的“精益求精”等等，

落款处均钤此“孙文之印”。

兽钮是近代印章中比较常用的一种印钮形式，而有一枚“孙文之印”（见图版二）则是以更为古朴的瓦钮为印钮。

瓦钮，又称“鼻钮”，是我国古代早期最为多见的印钮，因孔小如鼻而得名，汉代以后，鼻钮孔变大，故又称为瓦钮、桥钮。此枚“孙文之印”规格小巧玲珑，形态古朴沧桑，瓦钮中穿有绶带，可随身携带。

“孙文之印”（见图版三）也是孙中山的私印，这枚印章的特别之处在于它的材质和印钮雕刻。由于印章通体呈温润的黄色，因此很容易误以为其材质为寿山石中的田黄石，其实，经专家鉴定，它是寿山石无疑，但并不是田黄石，它缺少田黄石的重要特征，如细密清晰的萝卜纹等等，很有可能是另一种寿山石：溪黄石。

虽然不是珍稀的田黄石，但这枚印章还是很有看点，因为它的印钮采用了“薄意”雕刻技法。薄意，即极浅薄的浮雕，因雕刻层薄而富有画意，故名，是寿山石印章的一种独特的表现技法。薄意雕刻作品融书法、篆刻、绘画于一体，是介于绘画和雕刻之间的独特艺术。因此，对于雕刻者的要求是非常高的，需要有中国绘画笔墨基本功，要讲究构图、层次、刀工、线条等各种技艺。“孙文之印”的印钮以薄意雕刻山水，十分精妙，富有欣赏价值。

此外，还有几枚“孙文之章”、“孙

文之印”，或为透明璀璨的水晶质地，或为厚重坚实的象牙质地，都有着一定的艺术价值，十分精美。

一枚火漆印

火漆，亦名“封蜡”，以松脂、石蜡、焦油加颜料混合加热而制成，封粘时，用烛火引燃火漆，于熔成稠状时滴注于需要封粘之处，在将待凝固之前加盖印章，冷却后留下清晰的钤记图案，即为火漆封缄。这是一种防止信函被拆的封缄形式，特别用于机要信函的保护。火漆印即是待火漆凝固前加盖的印章。

“孙”（见图版四）就是这样一枚火漆印，铜制，印面为圆形，刻字“孙”。孙中山在其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常需发出函电联络工作或部署行动，如事关机密，便会使用此火漆印进行火漆封缄，以防函电被偷拆。

1922年至1923年间，孙中山与妻子宋庆龄一起居住在上海莫利爱路29号寓所。其间，孙中山就讨伐陈炯明、国民党改组等问题与国民党军政要员、北洋政府官员、各地军阀、商会、报馆等频繁互通电报。这些电报都事关重大、涉及机密，虽然我们现在无法找到已发出的电报原件，但想必发出电报、信函时孙中山会注意到保密问题，而钤盖火漆印是当时一种应用普遍的防止偷拆的方式。那么，当时就很有可能会使用到这枚“孙”火漆印。

宋庆龄的三个签名章

宋庆龄除了传统的印章之外，建国后还使用过三枚形制比较特别的印章，都是根据她的签名手迹制成。这三枚印章皆为长方形，两枚为宋庆龄的中文签名手迹“宋慶齡”，分别为木质和牛角质；一枚为她的英文签名手迹“Soong Ching Ling”，木质。

宋庆龄早期在自己的藏书上钤印时多用20年代刻制的“孙宋庆龄”印，而到了建国以后，则多用以上所提到的两枚“宋慶齡”签名章了。几乎每一本建国后的藏书都被钤上了这两枚印章，而题词或文稿、书信上则并没有发现，可见这两枚印章的主要作用就是藏书上的署名。

自幼在美国接受教育的宋庆龄，习惯于使用英文撰写文稿或书信，也常用英文签名。因此，她请人按照她的英文签名手迹刻制了一枚印章，可算是“中西合璧”的创新之举。但据考证，这枚印章宋庆龄使用的并不多，在大部分情况下，宋庆龄还是会在书信和文稿上亲自签名以示郑重。

“林泰之印”的渊源

宋庆龄的印章之中，有一枚“林泰之印”（见图版六），青田石质，狮钮，边款为“林泰同志正之，一九七九年二月，刘友石^[2]篆于沪”。印章的篆刻者刘友石先生在篆刻之时并不知道林泰是谁，组织上委托他这么刻，他就刻了，也不

便多问，直至宋庆龄去世之后一段时间他才知道自己是为大领导宋庆龄刻了一枚印章^[3]。

林泰是宋庆龄的化名之一，至于这个化名是如何产生的现在则难以考证确切。比较普遍的观点认为早年宋庆龄旅居德国时为躲避外界烦扰即开始使用此化名，“林泰”源自“林太太”，“林太”。另有一种观点，认为“林泰”是孙中山为宋庆龄取的别名，为了纪念他的泰国革命同志林文英^[4]。

且不论这个化名如何而来，可以确定的是，宋庆龄很喜欢用这个名字。不仅是旅居德国期间，抗战胜利后直至晚年，宋庆龄一直都在用这个化名。跟亲朋好友通信时，宋庆龄常署名为林泰，还要求对方在寄给她的信封上写“林泰收”。而早年的其他化名，马丹、琼英等则都很少再使用。

当时负责宋庆龄后勤保障工作的上海市政府机管局副局长李家炽的一段回忆阐明了“林泰之印”的刻制渊源。1979年2月，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叶剑英致信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彭冲，决定从国家财政中拨款5万元予宋庆龄，彭冲委托李家炽办理具体手续。李办好手续后即向宋庆龄汇报，宋庆龄表示感谢，并委托李家炽管理这笔钱。为了方便这笔钱的使用，宋庆龄还让李家炽刻了一枚名为“林泰”的印章，由李保管。随后李家炽将5万元拨款交代上海市委办公厅行政处财务科以“林泰”的名义



▲ 宋子良印微雕（局部）

存入银行。每次宋庆龄要用钱，便会派人带着她的亲笔信到上海，由李家焯办理取钱手续。^[5]

李家焯所提及的名为“林泰”的印章应该就是此枚“林泰之印”。鉴于在宋庆龄留下的书信文稿中从未发现有使用过这枚“林泰之印”，那么这枚印章仅是作取钱之用，基本是可以采信。

“宋子良印”上的微雕

宋子良是宋庆龄的第二个弟弟，毕业于美国范德比尔特大学，曾任中央建设银公司总经理、广东省财政厅长、中国国货银行总经理等职，后赴美定居。

宋庆龄与宋子良感情甚笃，她保存了一些宋子良的物品，包括一枚“宋子良印”。

“宋子良印”（见图版七）为象牙质，印面边长 1.5 厘米，通高 5.5 厘米，其出彩之处在于它的边款，印钮四面中的一面，也就是在一个宽 1.5 厘米长 5.5 厘米的平面中，刻有一组 463 字的微雕作品。用微距镜头采集下这组微雕，加以放大，便能看到很清晰的字体，笔法秀美流畅。从文字中可知，这组微雕由杜宗佛^[6]所刻，内容是清代名家所作的七首七律诗。

当然，这枚印章并非杜宗佛直接送给宋子良，而是史乃修^[7]请杜刻制后赠送给宋子良的，这在微雕文字中均有记载。

宋子良和宋庆龄的其他姐妹弟弟一样，后期即离开上海，没有再回来，因此他留在上海家中的很多东西便都由宋庆龄悉心保存下来了。

李燕娥的印章

“李燕娥印”是尺寸极小的一枚印章，铜制，辟邪钮，印面边长 1.6 厘米，通高仅 2.2 厘米。虽然印章的高度仅 2 厘米多，但辟邪印钮仍雕刻地十分精致生动。

对于宋庆龄而言，对于上海寓所而言，李燕娥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的人物。她是宋庆龄的贴身保姆，忠心耿耿为宋庆龄服务了五十余年；她又是上海寓所的管家，大小事情她都会替宋庆龄严格把关。宋庆龄对于李燕娥的感情是深厚

的，视之为亲人。在北京居住时，宋庆龄总是很记挂留在上海家中的李燕娥，不时寄一些可口的特产给她品尝，每逢李生日还要亲笔书写贺卡寄给她。李燕娥病重时，宋庆龄非常担心，专门派人接她到北京接受治疗。李燕娥过世后，宋庆龄还将她安葬在了宋氏墓地。

李燕娥曾长期居住在上海寓所内，这枚“李燕娥印”和她的其他生活用品一样，被保存在这里。

以上列举的几枚印章只是孙中山、宋庆龄藏印中的一小部分，它们背后虽没有承载厚重的历史，却真实地反映了孙中山、宋庆龄的工作和生活。孙中山、宋庆龄是革命者，不是收藏家，印章于他们而言更多的是作为微信的工具，而不是独立艺术品。我们发掘它们的艺术价值，从而了解伟人的审美情趣；而历史价值，则是这批印章最主要的意义所在。



[1] 陈融(1876-1955)，字协之，号颢厂，别号颢园、松斋、秋山等。早年留学日本，加入同盟会，参加黄花岗之役。1913年后历任广东法政学校监督，司法厅长、高等法院院长等职。1931年任广州国民政府秘书长。抗战期间避居越南。1949年寓居香港，卒于澳门。工诗，善书法、篆刻。著有《颢园诗话》、《黄梅花屋诗稿》，存世有《黄梅花屋印集》等。

[2] 刘友石(1929-2013)，江苏常州武进人，中国农工民主党党员，上海市书法家协会会员，上海集云阁高级篆刻师，国家工艺美术师，中国毛泽东书法艺术研究院顾问。篆刻作品有《毛主席诗词三十九首印谱》、《黄山七十二峰印谱》等等。

[3] 《一封“中央来信”改写了我的人生——记篆刻家刘友石》，《档案春秋》2008年第01期。

[4] 林文英(1873-1914)，出生于泰国的一个华侨家庭，1903年从泰国取日本求学，在横滨经廖仲恺介绍结识孙中山，受其影响，加入同盟会。曾与孙中山一起在泰国作反对帝制、宣传共和的演说。后参加镇南关、黄花岗诸役，成为孙中山的得力助手。因发表反袁言论于1914年3月被袁世凯拘捕入狱，继而秘密处决，时年43岁。

[5] 《我所经手的宋庆龄晚年的五笔钱》，《百年潮》2009年第12期。

[6] 杜宗佛(1901-1980)，山东掖县(今莱州)人，书画家、雕刻家，雕刻象牙以细腻丰富著称，其牙雕作品曾获美国芝加哥博览会最优等奖，解放后杜宗佛仍从事雕刻研究，以毛主席像及诗词为素材所作微雕作品曾引起轰动。

[7] 史乃修，曾任中华民国水泥厂总经理，善书法，建国后为南京市工商联领导成员之一，“五反”运动期间自杀身亡。

一件美国钞票公司印样

撰文 / 麦灵芝

宋庆龄上海寓所客厅的壁炉上有一个精致小巧的金属像架，一张中式建筑的黑白图片装帧在卡纸中，图片的下面有两行英文：SUN YAT-SEN MEMORIAL AMERICAN BANK NOTE COMPANY。

图片中的建筑是著名的广州中山纪念堂，英文译为 SUN YAT-SEN MEMORIAL。纪念堂是为纪念孙中山先生创立共和政体鞠躬尽瘁的伟大功绩而兴建的。1925年3月12日，担任中国国民党总理和广州军政府大元帅的孙中山先生在北京去世，举国为之悲恸。国民党人及各界人士纷纷采取各种方式纪念这位革命的先行者。1925年4月13日，当时的广东省省长胡汉民发表了《知海外同志书》，提出“以伟大之建筑，作永久之纪念”，倡议在广州筹建中山纪念堂的计划，鼓励民众踊跃募捐。倡议得到了海内外同胞的广泛响应，1926年1月，广州国民政府秘书处成立“建筑孙总理纪念堂委员会”，《广州民国日报》从1926年2月起连续数月刊登《悬赏征求建筑孙中山先生纪念堂纪念碑图案》公告，向



▲ 吕彦直

海内外悬赏征集中山纪念堂设计方案。1926年9月广州国民政府“筹建中山先生纪念堂委员会”聘请了美术、建筑专家在26份参选方案中进行评审，最终设计师吕彦直的方案获得了一等奖。吕彦直毕业于美国康奈尔大学，当时他正在主持设计南京中山陵，他设计的八角形宫殿式方案，庄严简朴，别具新意，外观上吸取了中国古代祭祀建筑的特点，



▲ 美国钞票公司印样相架

而其内部结构则运用了钢筋混凝土等近代西方建筑技术。中西合璧的方案也体现了孙中山：“取法西人的文明而用之”的民主革命精神，因而受到评选者的一致推崇。

1928年4月23日，中山纪念堂由上海陶馥记营造厂动工兴建。1929年1月15日纪念堂正式举行了奠基典仪，之后由于政局动荡，经费得不到保证，工程进度受到影响，中山纪念堂的主体建筑直到1931年月10月10日才基本建成，历时3年半。而室内的灯光设备以及周边道路等，则要到1933年5月才完成。遗憾的是，年仅35岁的设计师吕彦直1929年3月18日因病去世，没能看到他设计的纪念堂最后落成。

建成后的中山纪念堂，气势恢宏，

建筑面积约3700平方米，高约50米，由前后左右四个宫殿式重檐歇山抱厦，围绕中央巨大的八角形攒尖式屋顶，组成一个外方内圆的建筑整体。从外表看，纪念堂极富中国传统特色，蓝、白、红的主色调，象征着孙中山为之奋斗的革命理想：自由，平等，博爱。纪念堂正面悬挂着一块大匾，上面是孙中山亲笔书写的“天下为公”四个大字。纪念堂建在1921年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时，总统府所在地的西侧。1922年总统府因被陈炯明部炮火摧毁，成为一片废墟。纪念堂选址在此有着特别的历史意义和纪念意义，而纪念堂建筑本身完美的中西结合的建筑设计又成为中国近代建筑的经典之作。

宋庆龄保存的这张中山纪念堂图片，



▲ 修建过程中的中山纪念堂



▲ 修建好后的中山纪念堂

画面虽小但非常精细，仔细看还可以发现纪念堂上悬挂的“天下为公”四个字。从图下标注的英文：美国钞票公司（AMERICAN BANK NOTE COMPANY.）的字样，可以看出这张图片有着美国雕刻版印样的特点，画面纹路清晰明显。那么美国钞票公司又怎么会印制这张图片的呢？

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由于印钞技术与设备工艺相对落后，加上战事不断，因此不少银行都委托英、美等国的印钞公司代为设计印制。尤其是美国钞票公司，以其先进的技术设备成为承印中国纸币的主要公司。从美国钞票公司印制中国老银行纸币的存档样本中发现广东省银行1933年和1936年印制的

面值为1元、5元、10元大洋券的背面用的就是这张中山纪念堂的建筑图案。1933年正是中山纪念堂全面完工的时候，用新建的纪念建筑取代原来的银行大楼的图案也是在情理之中的。而广东省银行的前身中央银行，正是由孙中山先生创办的。

早在民国初年，孙中山先生就有了创办银行、发行纸币的想法。他说“钱币维何？不过交换之中准，而货币之代表耳。此代表之物，在工商未发达之国，多以金银为之，其在工商已发达之国，财货溢于金银千百万倍，则多以纸币代之。然则纸币者必将尽夺金银之用，而为未来之钱币，如金银之夺往昔之布帛刀贝之用，而为钱币也。此天然之进化，势所必至，理有固然。今欲以人事速其进行，是谓之革命，此钱币革命之理也。”^[1]

1923年3月，陈炯明被驱逐后，孙中山第三次在广州建立政权，设立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当时军阀势力仍很强大，分据广东的各路军阀均就地筹饷，破坏财政统一。外国银行和华商金融机构则常利用政局动荡制造金融风潮，伺机获利，加剧了广东金融市场的混乱。孙中山建立的政权面临着严重的财政危机。

为了调剂金融，补救经济，孙中山遂决定在广东创办中央银行。为筹措开办中央银行经费，孙中山任命宋子文为广东盐务稽核所所长，并指示将盐务稽核所的部分月收入以专户存储，并向美国钞票公司定印中央银行纸币。

经过一年多的筹备，1924年8月15日，中央银行在广州开幕，孙中山出席了开幕式并讲了话。中央银行成立后，隶属大本营财政部管辖，行长由宋子文担任，总行设在广州，并在汕头、香港等地设立分支机构，中央银行成立后，作为广东的金融中枢机构，发行过多种纸币，为巩固广东革命政府，奠定北伐的物质基础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后来国民革命军北伐，南京政府成立，1928年在上海另设中央银行。广州的中央银行为了分清界限，于1929年3月1日改称广东中央银行，隶属广东省政府管辖，从此变为地方政府银行。1932年元旦，又改为广东省银行。

由此可见，孙中山在广东组建的中央银行与之后的广东省银行是一脉相承的。1935年南京国民政府进行法币改革，取消了各省纸币发行权，但广东省以情

况特殊拒绝执行，直到1936年7月广东才还政中央，停止发行纸币。1936年广东省银行委托美国钞票公司承印的最后一批1元、5元、10元纸币用的还是中山纪念堂的图案。

无论是纪念堂还是银行印钞，这张美国钞票公司印样都与孙中山先生有着密切的关系。镶嵌着美国钞票公司印样的小像架，看似不起眼，宋庆龄却一直把它放在客厅最显眼的位置，时而放在客厅的壁炉上，时而置于客厅的茶几上，可见宋庆龄对它的喜爱之情。个中原由恐怕不仅仅是因为图片的精美，像架的精致，更重要的还是其本身所具有的纪念孙中山先生的象征意义，才是宋庆龄如此珍视它的真正原因吧。



[1]《倡议钱币革命对抗沙俄侵略通电》，《孙中山全集》（第二卷），第545页。



▲ 10元面值纸币（1933年4月印制）



▲ 10元面值纸币（1936年1月印制）

朝鲜刺绣挂屏《春香传》小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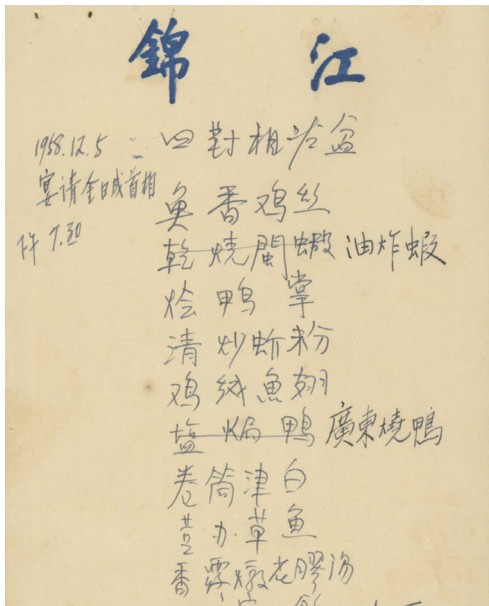
撰文 / 高海涛

1958年11月21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首相金日成率政府代表团访华。此前，他曾有过几次来访，但都是秘密或非正式的，这是他第一次正式公开访华。12月3日，金日成一行访问上海。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的宋庆龄于1958年12月5日在位于淮海中路1843号的上海家中设宴款待了金日成首相等国宾，时任外交部长的陈毅出席作陪。宾主畅谈中朝两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中朝两国人民的伟大友谊。

宋庆龄女士上海的寓所不仅是她休息的地方，也是处理国务的重要场所。宋庆龄女士家中位于一楼的餐厅她自己很少去，但是每当有重要客人到访，这个私人餐厅就是一个设国宴为家宴的重要场所。当时的国宴菜单中共有14道冷热菜和小吃，（菜单如图所示）包括鱼香鸡丝、烩鸭掌、鸡绒鱼翅等菜品，并将油糕以及杏仁茶作为甜品。所有菜品均由沪上知名的锦江饭店大厨上门烹



▲ 宋庆龄在上海寓所宴请金日成



▲ 宋庆龄宴请金日成的菜单



▲ 金日成赠送宋庆龄的刺绣《春香传》

饪，且菜单最先也是由锦江饭店大厨精心拟定的，但为人细心周到的宋庆龄在认真审阅菜单后，还是按照金日成的喜好进行了部分修改：将“盐焗鸭”改成了“广东烧鸭”、“干烧闽虾”换成了“油炸虾”。

当时金日成在宋庆龄寓所时，特地赠送了一副精美的刺绣《春香传》，之后宋庆龄将这幅刺绣挂在寓所餐厅里。金正日选择一副刺绣作为国务礼品，究竟是出于怎样的考虑呢？

刺绣这门技艺有着古老的历史，

朝鲜刺绣起源于朝鲜王朝时期（1392-1910），其种类主要分为服饰刺绣、器用刺绣、鉴赏刺绣以及佛教类刺绣。金日成赠送的是朝鲜刺绣类别中的鉴赏刺绣。鉴赏刺绣的主题丰富多彩，有描绘壮丽景色的风景刺绣，也有一些传统的故事。所以这幅刺绣首先体现的是一种文化，有很强的朝鲜特色；《春香传》是朝鲜半岛最为著名的爱情故事，也是朝鲜半岛现存的五个历史故事之一。《春香传》不是一部单纯的恋爱小说，它仅以爱情故事为情节线索，以反对卞学道的斗争为中心事件，抨击官僚腐朽统治主，反映人民的爱憎和愿望。无论哪个国家的人民，都可以从中找到故事给人带来的喜悦。将这幅主题鲜明的特色礼物作为国务礼品，相信是再合适不过的了。

在金日成用完晚宴告别之际，宋庆龄女士特地也赠送了两件银质器皿作为回礼，体现了主人待客的周到。

今天我们在故居的餐厅一角，可以看到这幅精美刺绣。但是在刺绣下方的英语翻译中，有些翻译错误。作为特有名词，《春香传》的英文可直接翻译为‘Chunhyangjeon’，而不是‘The story of Tsun hyang’，这在我们讲解的时候尤应注意。经过这些细致的考察后，我们对文物的了解会更深入，对历史的理解也会更透彻。

当年我们为主楼做的防潮措施

撰文 / 周和康

上海宋庆龄寓所，位于淮海中路1843号。墨绿色的大门，银灰色围墙，四周绿树成荫，三面围绕着40余株高大挺拔，郁郁葱葱的香樟树。宋庆龄十分喜爱香樟树，任凭它自由地生长，不太允许修剪枝叶，这是出于它生长太可爱，太美了。它的枝干挺直，树叶婆娑，一片翠绿，晨昏之间，淡幽幽的清香，四溢宜人。更可贵的是它四季常青。在冬天里，花园里的其他树木，都已开始凋零，它却依然生机勃勃，它的气味芳香，并能驱虫，防腐。它象征着女主人坚忍不拔，为革命事业献身的高贵品德。

寓所主楼，是一幢两层楼房（上面有二层阁，俗称假三层楼房），朝南坐北，冬暖夏凉。上下共有13间房，总建筑面积约为800平方米。主楼前面是一大片草坪，绿草茵茵。人们站在大草坪上看到这幢主楼，就像一艘船型的房屋。房顶的烟囱，好像迎风傲立的桅杆，上面还有一条鱼的风向标，随风转向，东南西北，一目了然。主楼每扇窗户，样子

都是舷窗式的。木制的墨绿色百叶窗上端，都雕刻着一艘迎风破浪的帆船图案。主楼的外墙经过粉刷，干净整洁。整幢主楼浸润在幽雅静谧的氛围中。

主楼的正门朝北，前有一个小门廊，进门时过道厅、客厅、餐厅、东书房、西书房、厨房，工作人员小餐厅。其中客厅、餐厅、过道厅都有壁炉。过道厅和西书房，各有专用的卫生间。在过道厅里有一个L型的扶梯通往二楼，楼上有二两间卧室和一间办公室，室内各有壁炉和专用的卫生间，另有一间冰箱间，电表间，熨衣间。

主楼各厅室下面是地下层泥地，较为潮湿。地面上铺有木阁栅，上面是木地板。1963年5月，主楼房屋开始大修。为了防止白蚁入侵和住房的安全，就把原有的木阁栅，全部调换成水泥阁栅。同时，为了做好地下层的防潮措施，在它的上面加铺了一层以煤屑为主掺进黄沙、水泥的搅拌浆，再用泥刀挤压括平，将地下层打理成为整洁，干燥，防潮的



▲ 寓所主楼的出风洞

一片净地。最后，把地下层原有的 10 个出风洞，整修油漆一新，增强空气对流，畅通无阻。

由于主楼前后地势有差距，南低北高，每当台风和暴雨来临之时，花园大草坪上，到处是积水，一片汪洋，水将要浸进主楼前面的出风洞，岌岌可危。为了防患未然，一定要采取必要的防水措施，设法用杉木板，按照各个出风洞的尺寸大小，加工制成 10 块防水板，按照出风洞的位置，从西到南顺序编号为 1-10，每当台风、暴雨到来之前，将防水板盖在出风洞口，木框周围，用石灰浆封牢得严严实实，保证不让大水漫进地下层去。日常这 10 块防水板，都存放在绿化工工具间的木箱里，需要时即可取出使用。这一工作，就落实到绿化工

王宝兴的职责中，由他负责放置，拆除。

据我所知，有关寓所房屋修缮工作，事先一定要向宋庆龄请示汇报，征得她同意后，才能进行。1964 年 3 月，宋庆龄从北京返回上海后，按照惯例，在李燕娥陪同下，来到寓所四周进行检查，对房屋修缮工作和环境清洁卫生给予了好评。并嘱咐我说：“周同志，这防水板做得蛮好，蛮实用。今后每年黄梅雨季到来，空气潮湿，湿度高时，一定要把防水板盖在出风洞口，以防止潮湿空气吹进地下室去，这样会使地下层受潮受损，影响到地板的使用期。待出梅后，就要立即拆除防水板，让干燥空气进入地下层通风。”现在每次到故居看到主楼四周的出风洞，我都想起敬爱的首长，想起那些我为故居服务的岁月。

彩髹描金漆櫨修复复制综叙

撰文 / 王克华

一、起始

漆，古文中为动词，漆是名词。《说文解字》谓之曰：“漆 木汁，可以漆物。象形。漆如水滴而下。凡漆之属皆从漆”^[1]。漆是从漆树科植物皮层采割时流下的黏结强汁液。经空气氧化产生凝固，其挥发物会“咬人”，即使有些人皮肤过敏。漆熬制加工合成生漆。漆的应用，漆的审美发现以及生漆文化形成的整合过程，是中国原生态化学最重要的根源之一，也是启蒙现代涂料工业和材料表面保护膜产业发展的始祖。一种物质能成其为文化的一个方面，只在它能满足人类生活进程需要的方面。人类在与自然的抗争中，经历了一个缓慢而漫长的认知过程，逐渐意识到“漆之为用也其大哉”，获得漆树和漆的应用知识，懂得漆许多特性：漆具有黏结力，能调和各种颜料，黏结物件，使器具色彩坚牢；漆固化后成膜坚硬，可保护器皿表面；漆有流变性和张力，可以饰物漆彩；漆能防腐，使器具经久耐用；漆具有装饰性，

使器具油光可鉴，色彩斑斓。漆具有的品性，构成了漆艺之源的物质基础与母性力量。经过人类心智的处理，选择，积淀，整合和物化过程，出于调色，图绘和黏结，修理，保护器具的需要^[2]，漆液，“取其坚牢于质，取其光彩于文”黏结，漆饰器物，如此，漆漆之器也就产生。早期的漆器器皿大都以漆碗、耳杯、豆、罐、筒等饮食生活用品之多，到春秋战国时在装饰上多样化，仿生、自然形体出现，至宋元明清其发展可谓百花齐放、形貌丰富。大型的家具类漆器随之涌现，在色彩纹饰中更为精彩。

上海宋庆龄故居二楼宋庆龄卧室壁炉前展示了一件彩髹描金漆櫨，因自然环境，人为使用等各种因素该漆櫨表面漆皮呈现脱落，翘皮，起皱等，逐渐有损朽现象，如不及时保护修复和抢救，其损坏程度会更加严重。馆领导和有关工作者本着对文物保护的态度，积极组织有关专家探讨，制定落实修复保护工作程序。为更好地保护文物，在文物修



▲ 受损的彩髹描金漆凳

复完成后，另再复制一件作为陈展之用。

二、漆器藏品材质规格与损坏状况

漆凳面 31cm×31cm。总高 47cm。四边均有 23cm。四角均有 6cm 斜边，其斜边从上而下沿凳裙边与四脚弧形融为一体。凳面厚 3cm，略带圆弧向内凹进 2cm 和 2cm 内边框，通过圆弧腰框线连接向外弧形的 9cm 宽裙边，裙边最宽度 42cm×42cm。四个脚框相应于四边角宽度似鼓形向内至下与脚踏组合。脚踏四正边均为 32cm×32cm，并延下与四脚蹬（三角形上宽 6cm，下宽 2cm，高 2cm）愈合。整个漆凳形态，方中带圆，圆中

见方。四脚边框向下 16cm 处又腰缩为 3.5cm。其制作工艺的表现略含传统明式家具的风味。

该件漆器文物的胎骨是木质。漆器胎骨，也称胎体，是承受漆饰之物。“质乃器之骨肉，不可不坚实也”^[3]。胎骨的品种和制作，在《髹饰录 质法》中有详细的记载，目前一般分木胎、金属胎、竹篾胎、皮胎、夹纆胎、纸胎、陶胎等几大门类，其中以木胎和夹纆胎（夹纆是布料或者纺织材料组成，为漆器工艺的专用词）的运用较为广泛。选之易干燥，不易变形的木料，作为家具类漆器的胎骨首选之一。常用的白桦、椴、松木等，

较轻便，而又能承受一般外力影响，制作容易。

漆橈周身颜色，底漆黑中带红。红与黑是中国传统漆器的代表色，《周礼》郑玄注记载：“髹，赤多黑少之色。”因其色类似鸟雀头部的朱褐色，又称之为“雀色”。朱漆——“中国红”就是漆的红，“赤，赭也。太阳之色也。”它热情，欢乐，喜庆，是中国的精神象征，寓意吉祥。黑色：在中国古代是一种庄重，威严和尊贵的颜色。它深沉，内敛，被认为是宇宙最初的色彩之一。红与黑，一个光明，一个黑暗，两色对比互衬形成了自然，朴素的和谐，交相辉映，相得益彰，由点至线，至面，乃至形状，编织着由暗到明，由清到浊，由浅到深，由柔到刚等人文哲学理念融合于不同的色彩空间。红与黑搭配组成中国传统漆器艺术的主色调。也达到“天成天质见玄黄”的艺术效果。

橈体全底漆面上以金色勾描图案线框，《髹饰录》称描金：“描金，一名泥金画，即纯金花纹也，朱地，黑地共宜焉”。花朵填朱红漆，树叶、筋、杆填于绿、蓝、黄、红等各色漆描彩。传统漆器制作工艺程序必然遵循古书记载的程序：“设色画漆也。其文各物备色，粉泽灿然如锦绣。细钩皴理以金漆，或划理。又有形质者，先以金漆描写，而后填五彩”^[4]。

橈面的主题呈绘四婴孩扑蝶戏游图，背景庭院假山花木，尤为显著一棵棕树，

该绘画内容出之于中国传统生活内涵的艺术题材，在北京故宫博物馆也珍藏类似画意的漆器文物^[5]。

漆橈边沿的圈帮为几何回纹，下沿为云纹，裙边与腿外侧、脚踏上衬都绘缠连花纹。而每朵主花都涂朱红，侧面叶片都涂漆绿彩，腿侧面又金漆描钩竹叶纹。这些图案显示“图必有意，意必吉祥”，在中国文化和佛教文化中意向具有洁净、圆满，生生不息的寓意^[6]。

橈面的彩漆局部磨损，四周的角边以及腿部、脚踏沿角上都出现漆面开裂、脱落、起翘、粉化、空鼓、皱缩等现象，这些证实了宋庆龄生活中常常接触和使用此物，深得她的喜爱。其次漆器自身“生命力”随环境（气温、湿度、阳光、壁炉，或长时间搁置）影响，漆器物体各生物细胞的物化系数变化，随时间延续而慢慢显出衰老的状态。

从漆器材料分析：胎骨是木材，是生物，外装饰的是漆，也取之于自然。漆与木胎二种物质，各物化系数值在长时间应对环境变化都不相似，我们观察到的只是漆器的表面损伤部分，而实际是内在木材收缩应力变化导致的胎体与漆层空鼓或者漆面裂痕、翘皮等现象。漆器在生活使用过程中碰触和磨损现象属为正常。

三、漆器文物藏品叙证

此件漆器藏品在众多关于描写宋庆龄的书籍中都无法查阅到。只是了解到宋庆龄婚后，父母曾赠送一套藤木家具，

但没有侦述到这件漆橿的踪迹。

根据这件漆橿的质地、造型、制作工艺和绘描艺术风格表现，笔者倾向认为这是民国前期制造的一件上好的生活漆器家具，其制造产地在福建或江南区域。

四、漆器藏品修复与复制

1. 修复

历史的真实性和艺术美感是漆器文物所具有的两个基本特征，全面真实地保存漆文化财产承载的历史信息，修复因自然力或人为造成的损坏，延续漆器遗存的生命，再现漆器文化遗产的原始风貌是漆器文物修复保护的最终目的。文物修复必须遵循以下几项原则：

（1）“修旧如旧”保持文物原貌。要求尽可能多的保留文物时代所留承的形态信息。所采取的修复工艺技术不应対文物造成第二次损害。

（2）所使用的材料尽可能为自然材质或者是相同原材料，亦是保持材质的物化系数一致。其次使用自然粘接剂、辅料都必须是可逆性材料，确保化学试剂在应用中对漆器（漆器表面和木胎）无次生损坏和间接或隐式损伤因素存在。

针对这件漆橿，我们采取了以下步骤修复：

（1）除污。对修复漆器的原损坏部位（脱落，翘皮，起皱）作“创口”处理，清除镶嵌漆皮缝隙和表面的细小脏物以及其它污迹。



▲ 修复后的彩髹描金漆橿

（2）软化。用浸湿漆皮软化剂的毛布或药棉覆盖在已损坏要修复的漆器部位之上，润湿漆皮，使其溶胀回软，以便漆皮恢复原状。

（3）嵌补。对漆橿的各沿口缺损部位进行填充嵌补并加固定型。

（4）黏接。采用三种不同的黏结剂。渗透性粘结剂使木胎加固，防收缩变形，漆灰层粘结剂则防止分化脱落，二者功能相似，与其结合的材料不同。漆皮的黏结剂有些不具有较强的黏合力，可能对漆不起任何化学反应，其修复工艺有贴、灌、注、渗等技术支持。

（5）清除修补部位的修复痕迹，并作旧，并调整漆橿修复后的视觉效果。

2. 复制

因原文物珍贵且易损，不易在自然环境中长期裸展，复制一件相似原文物是行业内保护文物的一项措施。其项工

作是要求把物器“原汁原味”的再生。

漆器看似简单，但制作工序环节繁多，每道工序都需仔细，此次复制亦按照《辍耕录》记载的传统工序复制。^[7]

(1) 取干燥松木材料，按原器的大小尺寸规格以及传统工艺制作木胎骨。

(2) 漆灰层涂于木胎骨上。工艺流程：修胎、封缝、磨整、标贴、刮灰。

(3) 罩髹底漆（数次）磨顺推光。

(4) 描金构图：先在原物的各面图案用纸复印，然后移植在仿制品，再描金构图、上色添彩。

(5) 罩髹光漆，磨顺推光。

(6) 按原貌缺失的形态，一层一层用“剥落、剔去，擦痕、端接”等特殊工艺技巧加意模仿，并要整体协调做旧。

漆器的修复和复制工作都必需在一个特定的环境完成，即设定温度为23度-28度，湿度为80以上的较为封闭的室内，称之“荫室”，古籍中称之“暑溽”条云：“暑溽，即荫室，大雨行时，湿热郁蒸”。杨注：“荫室中以水湿则气熏蒸，不然则漆难干，古曰大雨时行，盖以季夏之候者，取湿热之气矣”^[8]。

荫室是制造漆器主要的设备之一，因漆的干燥，需要适宜的温湿度。如髹漆后的漆器暴露在外，不但易沾染尘灰，使漆面受污，且妨碍漆的干燥，荫室既可避灰尘，也易于控制调节漆器干燥所需的温湿度。

五、结语

从传统的生漆到半透明再到色漆形器，制作工艺是个极其漫长而繁琐的手工艺技术过程。而真正能掌握漆器传统工艺技术的能工巧匠在现实的社会中也许已是凤毛麟角的老前辈了。宋庆龄故居纪念馆领导与研究保护工作者以负于职责的使命感而为此荣幸。特意留笔。



[1] 许慎：《说文解字》，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65页。

[2] 张飞龙：《生漆的应用》，《林产化学工业全书（第2卷）》，中国林业出版社2001年版。

[3] 黄成：《髹饰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71页。

[4] 王世襄：《髹饰录 坤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5] 朱家潜：《中国漆器全集（第6卷）》，福建美术出版社1993年版，第154页，第155页。

[6] 丁文夫：《王世襄柜》，文物出版社2012年版，第13页。

[7][8] 沈福文：《中国漆艺美术史》，人民美术出版社1992年版，第94页，第128页。

（作者系上海博物馆文博馆员）

浅谈故居安全工作中的安全用电

撰文 / 葛伟峰

2006年8月，我进入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工作，主要职责是电器设备管理。故居用电安全是保护文物安全的重要前提，在实际管理工作中，我深知自己所肩负的重大责任，不断学习思考如何保证电器设备的安全运作，确保故居的安全。

从电力学角度来讲，电可分为强电和弱电。强电一般是指设备的能源供应，弱电是指设备信息的传递与控制。强电又分为高压和低压，从专业术语来说线电压大于500V的为高压电，小于500V的为低压电。本馆的总供电电压为380V，从供电部门来说我馆属于低压用户。虽然我们使用的是低压电力，如果不能做到安全使用，还是可能会带来各种人身伤害和火灾等灾害性的事故。为避免这些事故的发生，必须从设备的安装施工、维护保养、日常使用和管理等几个方面严格把关、规范操作。

一、各类设备的正确安装

1. 开关的正确安装。开关从用电安全的考虑是作为用电线路上的一个明显断开点，开关必须安装在相线上，这是因为如果将开关装设在零线上，虽然关闭开关时设备也不工作，但设备的相线仍然是接通

的，而人们误以为设备没有工作，就会错误地认为是处于断电状态。而实际上设备各相线接触点的对地电压仍是220伏的工作电压。如果此时人们触及这些实际上带电的部位，就会造成触电伤害事故。所以各种照明开关等用电设备的开关，必须串接在相线上，才能确保安全。因此我馆在设备安装或是维修施工时特别注意此方面，避免由此产生人身伤害事故。

2. 插座的正确安装。我国国标插座为三孔插座，这是因为三孔插座上有专用的保护接零（地）插孔，在采用接零保护时，有人常常仅在插座底内将此孔接线桩与引入插座内的那根零线直接相连，这是极为危险的。因为如果电源的零线发生断开，或者施工人员将电源的相线、零线接反，会使使用该插座的设备的外壳等金属部分带电，这将会直接导致设备使用者触电，发生伤害事故。所以，在我馆装饰装修施工结束后，必定用测电笔对新安装的插座进行检查，以检验施工的安全质量。

3. 绝缘导线不直接埋设在墙体内。这是因为绝缘导线长时间满载或超载使用后，绝缘层会发生老化龟裂，绝缘水平大大降

低，当发生线路短时过载或短路时，更易加速绝缘体的损坏。对于砖木结构建筑，梅雨季节如发生墙体受潮，绝缘损坏的导线容易引起墙体受潮部位大面积漏电，危及人身安全。绝缘导线直接暗埋必须符合低压用电安全规范施工。因此我馆在装修施工时，即便线路再短、线路数量再少，也坚持导线暗管铺设必须穿管埋设。

4. 加装漏电保护。必须加装漏电保护开关，可以防止由于电气设备或电气线路漏电引起的触电事故带来的人身伤害。且能及时切断电气设备运行中的单相接地故障，可防止因线路长时间漏电引起的电气火灾事故。因此，实际工作中我馆在涉及人员经常性操作使用的设备的线路前端安装漏电保护开关或安装带有漏电保护功能的空气开关。

5. 必须安装接地线。接地线有被称作生命线，它是电网系统中直接连接大地的线路。能将因各种原因产生的不安全的电荷或者漏电电流导入大地，避免发生人身伤害。我们一般采用的都是保护接地方式。所以，我馆对于设备机柜、线路金属桥架、线路金属管等属于金属材质部位的接地装置要求安装可靠，并做好每年的专业单位的定期检测。

二、维护保养时必须注重的方面

1. 巡视设备时应注意供电设备有无发热、有无电火花现象。电能和热能有着紧密的关系，供电设备发生发热现象往往有几种可能：一种是满载或过载，单条供电

线路上同时使用的设备过多，会造成包括开关、线缆、插座等部位发生发热现象，此时应采取关闭部分设备并将部分设备转移至其他供电线路；还有可能是供电设备或线缆之间的连接紧固性差，会造成连接处接触电阻增大，电流阻断加大，发热现象往往发生在较为固定的位置，如果连接处的紧固性差到一定程度，介于断续接触点之间原本绝缘的空气会被瞬间击穿，此时会有电火花产生（俗称为“打火”现象），此时对设备安全来讲是非常危险的，必须立即停电，采取重新紧固或连接措施。

2. 做好每年的接地测试工作。每年由检测单位对馆内所有接地线路、弱电机柜外壳、配电柜外壳、避雷设备进行检测，应保证保护接地电阻不大于4欧姆，避雷设备接地电阻不大于10欧姆，保证接地可靠。

安全用电不仅仅关系到我馆的文物安全，更涉及到参观者和我们工作人员的人身安全，对于每一位故居人来说安全用电只有起点，没有终点，并且安全用电没有及格，只有满分，作为一名电器设备管理人员责无旁贷，必须在实际工作中加强责任心，并且不断提高管理水平。当然安全用电也不是只依靠几个专职管理人员就可以得到保障，而是依靠每一位故居人的充分重视、积极配合、严格执行安全用电制度，安全用电才能真正得以保证。从我做起，加强安全意识，让我们共同为故居努力创造一个优美和安全的参观环境。

大英博物馆见闻录

撰文 / 费佳



▲ 大英博物馆

大英博物馆 (British Museum)，又名不列颠博物馆，是位于英国伦敦的一家综合博物馆，也是世界上规模最大、最著名的博物馆之一，它成立于1753年，拥有藏品800多万件，1759年1月15日起正式对公众开放。

大英博物馆和纽约的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巴黎的卢浮宫同列为世界三大博物馆。大英博物馆内设有埃及文物馆、希腊罗马文物馆、西亚文物馆、欧洲中

世纪文物馆和东方艺术文物馆。其中以埃及文物馆、希腊罗马文物馆和东方艺术文物馆藏品最引人注目，其所收藏的古罗马遗迹、古希腊雕像和埃及木乃伊闻名于世，而东方文物的收藏主要包括中国、印度、日本、韩国、波斯及南亚和东南亚等地的艺术品。中国收藏品中以东晋画家顾恺之的《女史箴图》最为知名，还有商周青铜器和敦煌文物也是非常珍贵的藏品。

大英博物馆的免费开放

今天的大英博物馆作为英国的标志性景点，每天都向公众免费开放，每年的游客量超过600万人。大英博物馆由政府提供70%的资金，剩下的30%来自于博物馆经营的商店、餐厅及社会捐赠。此外，大英博物馆还实行会员制度，会员主要由捐献者组成，目前大约共有2



▲ 大英博物馆内部

万左右的会员。对于重要捐献者，大英博物馆还会把他的名字写在墙上。大英博物馆还经常收到一些艺术基金会的捐赠，由他们提供资金，然后博物馆去选择艺术品购买。

在参观过程中，我了解到，其实关于大英博物馆要不要收费，还在英国引起过争论。大英博物馆主要依靠国家全额拨款，用的是纳税人的钱，但是，到大英博物馆参观的绝大多数却是外国人。就有人提出，国家给大英博物馆补贴，得益的却多数是外国人，这样是不是损害了英国人的利益？不过，更多人认为，如果大英博物馆改为收费模式，那么经济收入比较低、文化水平比较低的那个阶层，是进不了博物馆的。这样一来，经济的不平等变成了教育的不平等，会让社会断层更加明显，社会矛盾更加严重。大英博物馆就像知识的海洋，允许民众，无论贫富贵贱，可以一次次自由地出入，最终将使得国民的素质有所提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不收费，短期来看是亏本了，但是长远来看，却是非

常重要的投资。其实不只是大英博物馆，英国的国家画廊、国家肖像画廊、泰特美术馆、泰特现代美术馆、维多利亚及亚伯特博物馆等，也都是免费参观的。

英博物馆馆长尼尔·麦格雷戈曾表示，大英博物馆之所以坚持免费开放，是因为博物馆能够吸引公众前来，通过数次的参观来仔细品味博物馆的藏品是最为重要的。对于一个成功的博物馆来说，它应该能吸引公众一年内数次前往博物馆去探索其藏品。对于大部分博物馆来说，这不能仅依靠临时展览，而是要看它们的固定馆藏。公众会认为博物馆的藏品就是属于自己的，他们可以像使用自己家里的图书、自己的东西一样去用这些藏品。“这就是为什么博物馆免费是尤其重要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参观者随时回来。”

大英博物馆的文物故事

大英博物馆藏品丰富，其中还有许多有趣的文物故事，例如，有一个公元一世纪的波特兰瓶，几乎每位到大英博物馆的游客都会去看它，就是因为它的“传奇故事”。

原来，这件文物虽然制作精美，但并不是大英博物馆最顶级的文物，没有那么多人关注它，直到1845年，一个英国人进入大英博物馆，把这个波特兰瓶给砸碎了，而他的目的竟然是，为了清史留名！

早年的博物馆，并没有今天这样严

密的安保措施，展品就是放在架子上，供给游人观看的。那个英国人就抓住这个漏洞，故意找机会砸碎这件文物，他认为，如此一来，以后大英博物馆的历史上就会留下一个永远的记录：某年某月某日，某某人把我们文物砸毁。后来，这个英国人被抓了起来，但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的目的也达到了。

故事还没完，为了修复这件珍贵的文物，大英博物馆的文物修复专家将两百多块碎片一块块拼接起来，最后又修复成完好如初的样子。最有趣的是，修复波特兰瓶的黏合剂是有时限的。每过几十年，大英博物馆就要把它解体，再重新粘起来。所以这个波特兰瓶从粘好到现在150年间，已经被三次解体再修复了！

可以说，就是因为这样富有传奇色彩的故事，让这件文物成为人们到大英博物馆必看的文物。

当然，上面的这个“文物故事”是个特例，大英博物馆对文物的研究更多的时候还是从进化史、文明史的角度看人类发展的进程和人类文明的未来走向。而这种研究最有代表性的成果就是《大英博物馆世界简史》。

《大英博物馆世界简史》由大英博物馆和英国国家广播公司（BBC）联合打造，由大英博物馆馆长尼尔·麦格雷戈亲自撰写，动员100多名馆员、400多名专家，编撰时间长达4年，从大英博物馆800万件馆藏中精选了100件最具代

表性的物品，全面展现了人类200万年文明史，其中有10件中国藏品入选。

编辑《大英博物馆世界简史》曾被称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该书的主旨就是“通过文物来讲述历史”。书中展示了100件最具代表性的藏品，其中包括读者熟悉的埃及木乃伊、玛雅玉米神像、莫尔德黄金披肩、拉吉浮雕、阿拉伯铜手、婆罗浮屠佛陀头像、中国青花瓷、石器时代工具、俄罗斯革命瓷盘等。更有读者意想不到的现代社会的信用卡、中国的太阳能灯具与充电器等——用触手可及的具体文物作为支撑世界历史的基点，结合彼时历史背景，对藏品进行了全方位、多角度的介绍，并力图还原隐藏其后的不为人知的历史真相，是该书一大特色。

《大英博物馆世界简史》因视角独特、配图精美、藏品权威、语言生动活泼而在全球极具影响力。2010年，这一项“全世界只有大英博物馆才能办到的世界史撰写计划”曾以广播形式在BBC播出时，创下了1100万人口同时收听的纪录，《纽约时报》盛赞其为“空前绝后的贡献”。《大英博物馆世界简史》在中国推出后，也是大受欢迎，长期在历史类图书中位列畅销榜首位。

大英博物馆的教育工作

大英博物馆十分重视发挥社会教育功能，在硬件方面有数个专门用于青少年教育的场所：包括四个教室、两个礼堂、

数字发现中心、接待站、衣柜和午餐室，能容纳 140 ~ 350 人。大英博物馆的社会教育工作分为针对未成人的教育活动和针对成人的教育活动。

大英博物馆针对未成年人开展的教育活动包括直接教学、协助教师引导参观、协助教室教学和特殊教育项目。直接教学在展厅、大英博物馆的教育场所和学校进行。在大英博物馆进行的教育活动包括工作坊、座谈、研究班和表演等形式。工作坊的活动最多可以接待 35 名学生，这里组织的活动大多可以直接接触文物。如会让孩子们接触一些埃及文物的原件和复制品，以帮助他们理解考古发掘的过程。工作坊的活动还包括角色扮演和第一人称的解说，如孩子们会扮演进行和平谈判的古希腊城的外交大使。工作坊有时还会开展一些音乐、舞蹈和喜剧。如组织戏剧工作人员与一群学生一起以博物馆的文物为基础编排喜剧故事。博物馆藏品都是人类艺术和技术的结晶，所以大英博物馆的工作人员还致力于让学生参与到艺术技巧的实际运用之中，如学生会在与在学校接触不到和中国书画亲密接触，他们甚至还会使用古波斯的设备和伊朗伊斯兰时代的颜料在纺织面料上作画！

大英博物馆有一支专门从事成人教育活动的团队。这只团队由三人组成，包括成人项目领导、艺术史教育官员和项目经理。成人学习项目在于实现创造

性、多样性、参与性、令人愉悦等目标。一般会通过讲演、研究班、讲座、工作坊、辩论和表演等形式实施，往往会与艺术史专家、考古学者、馆员、音乐家、舞蹈家等人员一起工作。他们与伦敦大学建立了良好的联系，为大学组织音乐会、喜剧活动、制作纺织品和瓷器的工作坊活动等等。

大英博物馆的文化产品也承担着教育和文化传播的功能。根据不同的客户需求，大英博物馆设计制作了不同的文化产品。如首饰、艺术品等文化产品价格比较高，是针对一些高端需求的客户设置的；书店按照不同的主题将书摆放开来，针对不同的客户有不同种类的图书；另外还设有相关展览的书店和低价纪念品商店及儿童文化产品销售区。其中《大英博物馆的精品》(Masterpiece of the British Museum) 一书得到了大多数游客的青睐。

作为一个文博行业的工作者，到大英博物馆参观游览难免会有“朝圣”的心态，以上就是我此次在大英博物馆短短一天参观之后的心得体会。事实上，中国与英国国情不同，故居和大英博物馆也完全不在一个层级，但是我想，作为博物馆，总有一些共性的东西：让更多的受众走进博物馆，让文物发挥更大的作用，让博物馆教育民众，这既是大英博物馆的职能所在，同时，也应是我們不可推卸的责任！

关于纪念馆服务工作的几点假想

撰文 / 许毅捷

纪念馆在日常工作的开展中，始终将宣传教育、弘扬精神作为工作的要义，并在某种程度上将我们提供的以达到宣传教育为目的的手段称之为“服务”。比如，开展讲解接待、巡展宣讲以及各类主题活动。不可否认，从广义上讲，这些工作确是属于“服务”的范畴。但随着人们日益开阔的眼界，对于服务的需求也在逐步的提升，从单纯地满足于主体服务的完善，扩展到对于配套服务要求的提高，我们不能再满足于5年甚至10年前对于场馆配套设施、人员素质的状况，我们是否应该本着“以人为本”的理念，升级完善各类设备设施，不断提升员工的幸福感，从而在细节、在软实力上将服务打造得更为卓越？

一、服务范围的假想

长久以来，我们习惯性地将游客作为我们的服务对象，所以通常将一线接待人员理解成提供服务的人员，所以反复强调他们服务意识的提升，服务能力



▲ 整治参观环境

的提升。但作为行政部门，其实也应该有服务的意识、服务的能力，行政不光光是管理，同时也包含了服务的要素，行政人员的服务对象就是职工，如何把职工服务好，让他们在岗位中能够得到足够的认同，感受到幸福，这也是很重要的。只有这样，员工才能在工作中发挥最大的主观能动性，把工作做好，而不仅仅是完成。

在这一点上，不得不提及一些外企，虽然他们平日的工作节奏很快、压力很大，但在完成一个项目之后，项目总监甚至更高级别的行政人员，都会以不同

的形式向参与人员表达感谢，有时仅仅是一张亲笔签署的答谢卡片，但那一份感动和被认可的感觉很快就转化为了投入下一个项目的动力。可能由于体制的不同，没有经济利益的趋使，使得体制内的工作人员职业安全系数更高，工作的热情就显得不那么高。在这样一种状况下，就更需要考虑到员工的基本需求、期望需求和超期望需求，以满足超期望需求为追求，来铸就员工在职业领域的幸福感，想来也是不错的。

二、服务要求的假想

今夏，笔者有幸去了一次位于日本福岡北九州市的太空世界，深深被日本人对于细节的专注所折服。一是在游乐场餐厅里点的那份抹茶红豆冰，里面的冰块也是抹茶味的，这样一来，在炎炎的夏日，可以保证喝到的第一口和最后一口抹茶的浓郁程度是一样的，而不会因为普通冰块融化而稀释口感；二是购买的纪念品，由于都是一些小挂件，结账后就都装在一个大的袋子里了，回去后，才发现收银员按照挂件的数量给了我相应数量和尺寸的小袋子，以便作为礼物赠送时候的包装。这两个小细节真的让我感动，作为一家游乐场，并不是专门的餐饮店和商场，却可以提供这样超乎我想象的专业服务。对比国内的一些景点，饭难吃是必然的，卖的商品又

大同小异，当然就纪念品个性化这一项，我觉得我们馆做的还是很不错的，但对于细节上的专注，还是很有深度可以挖掘的，要做一个追求完美的细节控。

三、服务评价机制的假想

一直以来，我们对于服务工作的评价比较总是和同行业的博物馆、纪念馆比，学习借鉴了很多很好的经验。但设想一下，把单个的服务项目抽出来，放到同种项目中进行比较，是不是能有更大的提升空间呢？比如将保洁工作与酒店、大型商场、商务楼的保洁一同对比，就会发现我们的保洁工作略显简单；再比如，目前基本上酒店、商场、商务楼甚至一些公共厕所里都是有冷热水的，而我们还是只有冷水，只能满足最起码的清洁要求，总觉得不是很人性。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从这些对比中找到差距，从而提升服务的质量，也可以算是一个很好的途径吧。

四、结语

以上几点假想，是笔者最近在我们服务工作领域内的几点思考。如果我们在各类配套服务工作的细节上追求完美，那么我们将给游客创造一个更加舒适的参观环境，给员工创造更加美好的工作环境。这样具有人文关怀的场所，一定会给大家留下终身难忘的美好印象。

《最后的女皇》 ——蒋介石夫人和现代中国的诞生》

选译（连载）

译文 / 宫洁菁

50

就在这段时间，为了排解紧张情绪，美龄开始学画。“发生了一件极棒的事；你一定不会相信，”她1951年秋天写信给爱玛。“过去五个月我在学习中国画，所有国画家和这一行的专家们都认为我有可能成为一个优秀的画家。有些甚至说我可能会成为最伟大的健在的画家……我自己相信这些权威们说的是事实，因为，很奇怪，画画对我来说没有难度……我必须承认一开始我也不相信他们的话……画画是我所知道的最引人入胜的职业。我在作画的时候，会忘记世上的一切，真希望我可以把所有的时间都放在画画上，就这样一直画下去。

美龄雇了两个大师，他们用她的私人轿车接她去住所，教授她作画的技巧。刚开始蒋会嘲笑她——“如果你在画画上有天份，怎么可能以前都没有发现……你现在这个年纪不可能有什么成就了。”——但是，随着她的画技越来越

纯熟，他允许她在客人来拜访的时候把画挂起来，这样人家就会对她的作品表示赞赏。哈恩称这为“历史悠久的，保全面子的惯例，”蒋也改变了论调：“我是觉得你可以的，只是我知道如果听上去很简单的话，你就不会继续了。我是故意那样说来鼓励你的。”

跟蒋一样，美龄没有意识到她是活在一个茧里，把她束缚在那里对纺纱的人来说有好处。“几天前从Jo Lansing那里得到了你画作的照片，”爱玛六个月后写信给她。“她把照片给三个专家看了，没有点明作者是谁，专家们都认为这是个真正有画画天份的人画的。他们认为画是临摹的，建议作者画更多的原创作品，以获得更多自由发挥的空间。Jo自己不是画家，但深受感动，我也是……我很希望你能继续下去，不仅因为你有这方面的能力，也因为你能从中获得满足感。”

……

尽管精神生活给她带来欢乐，但身体状况却给美龄制造了麻烦。自从她抵达台湾，她的神经性皮炎就不断发作，1951年更加恶化了。为了减轻痛楚，她的医生给她开了一剂新药。“这药很神奇，”她写信给爱玛说。“两天后我的皮肤完全好了，我感觉非常棒，充满活力，一星期之内就把我以前要做三个月的工作都完成了。唯一的麻烦是我晚上只能睡着两到三个小时，因为这药的兴奋作用……药效很强大，但是，不能总是依赖这个药。”然而，六个月后，她还在服用这种药，这不仅让她持续兴奋，还使她“看上去非常浮肿。”

1952年8月，美龄飞赴旧金山，在那里的医院里住了两个月接受治疗。医生告诉她得留在美国做康复治疗，她便搭乘一架联合航空的飞机去纽约，飞机里为她安置了一张“特殊的床”，她搬到了长岛的孔家。9月，她收到蒋的一份电报，询问她的身体状况，并诉相思之情。

“天气很冷，不潮湿了，这种气候适宜你回台湾来休养，我希望你很快能回来。”但美龄没有回去，错过了蒋66岁的生日，以及他们结婚25周年的纪念日。“今年我们不能在一起真是太遗憾了，”他发电报说“……我希望从今往后我们每年都能一起度过，再也不分开。”

美龄想参加1月份艾森豪威尔的就职典礼，但在“纯国内活动”中出现外国首脑（或他们的夫人）是没有先例的，所以她只能被安排3月份去白宫喝茶。

在那里，据顾维钧说，“蒋夫人很有技巧，她后来自信地告诉我，要提出几个对我们国家有利的严肃问题来引起总统的注意。”接下来一个月，美龄不顾医生的建议，“突然”决定回家。原因跟她的朋友吴国祯有关。

吴国祯博士，台湾的主席，是个宽容大度的人，也是一个改革家。他在美国的声誉很好，《时代》在1950年夏天把他选作封面人物。从那以后，蒋就试图诱使，甚至强迫他跟经国合作。1952年，吴在岛上各区巡视，督促当地的领导们不要“抬头”去讨好上级，而应该“低头”为他们的人民服务。“我回到台北，”吴说，“就听说我的演讲大大冒犯了蒋。我还在外巡视期间，他就表现出了他的不悦，每天处决8到10个人……指控他们是共产党员，或者跟共产党有关。”他说，这次处决杀了近100个人。1952年11月，吴作了一次类似的巡游，就在大选之前，他离开后998人被捕，经国所管辖的秘密特务的各个分支机构干的，然而遭到质疑的时候，特务们只能对三或四个被捕的人提供犯罪证据。吴解释说，这些被拘留者是“各地区的民间领袖。抓他们就是为了恐吓他们在即将到来的大选中按某种方式投票”；这样，“所有反对国民党候选人的都被……消灭了。”最后一击就是绑架两个市议员。吴认为那个特务有责任，应该被开除，但蒋反倒为他升了职。

发现自己被监视，电话被窃听，佣

人也出卖他后，吴想要辞职，但被蒋拒绝了，蒋宣称主席是“忧虑过度”，给了他一个月的病假。吴带着他的妻子回到日月潭的家里，说如果不同意他辞职他就不会再回去。根据他自己所说的，主席“很受台湾人民的欢迎”“在美国媒体也是个有份量的人物，”所以蒋决定让他回来。

吴辞职的消息一传出美龄就飞回家了。“她一点也不喜欢蒋经国，”吴说，“她知道如果我走，那么经国的位子就更稳固了。”但蒋夫人要回来使得吴陷入了一个中国式的窘境：如果去接她，那么他就是在否认自己要辞职；如果不去，那么就社交而言他是失礼的。蒋家和吴家在社交场上是很好的朋友，所以吴就派自己的妻子，伊迪丝去机场。蒋也在那里，“他在所有人面前热情地向她微笑寒暄。”

“我是为了国祯回来的，”美龄一看见吴的妻子就悄悄告诉她。“能否请你叫国祯立刻离开日月潭。我很惊讶他今天居然不来这里接我。”吴的妻子回答说她知道自己的丈夫是不会回来的，美龄便说她第二天会亲自去看他。但是蒋拒绝让她去。来来回回传了大量口信之后，吴最终答应下山去见美龄。尽管她坚持和他在家外谈话，因为家里有窃听装置，但双方并没有达成共识。

吴回山上的时候差点被暗杀。他的车显然被做了手脚，要不是他和他妻子临时改变计划，停下来去了教堂，让司

机和机修工检查车子，他们就都被杀了。吴决心搞清楚蒋是否参与阴谋的策划，他写了封信给蒋，引用了一个忠臣因受人诬告而行将被国君处死前写的话：“余罪该一死，然君终圣明。”还加了一个问题“尊敬的阁下能否对你忠诚的仆人多一些仁慈？”他要求跟大元帅见面。“蒋，”他以中国逻辑说，“反应只可能有两种。如果他对阴谋一无所知，就认为我对他有严重误解，会叫我去见他……如果他知道，就会意识到我已猜出他在幕后指使，他就不会见我。”不出所料，吴没有收到回复，一周以后他的主席职务被解除了。

55

不到两年，1969年2月快结束的时候，美龄的小弟弟，宋子安，广东银行的主席，因脑溢血在香港去世，享年61岁。他的遗体被带回旧金山，在那里的格雷斯大教堂举行了一个仪式。据旧金山年谱记载，蒋夫人出现在悼念者中，“健康状况很差……看上去很忧愁……需要人搀扶”走进大教堂。除了庆龄，宋家的兄弟姐妹都到了，年谱记载，“庆龄选择呆在中国大陆。”然而，这样选择并不是她本人的意愿。子安一直是庆龄最喜爱的弟弟，可是她就连发个吊唁的电报都要经过周恩来夫妇的帮助才能被允许。

六个月后，蒋和美龄坐轿车去他们山上的房子，途中遇到一辆吉普车突然

转向。在前面护送的引导车猛地刹车，两个人乘坐的轿车一下子撞在引导车上。大约一年后，夫人的秘书告诉爱玛·米尔斯，夫人“还是不能写字或画画，不能靠左腿支撑站立”由于“脑部的撞击太严重，导致脊髓受伤，所以右手臂和左腿会疼。”和她丈夫不同的是，美龄在医院里住了一段时间，治疗撞击和其他脊髓伤害，但是治疗持续了一个月仍未见效——直到尼克松总统派美国的骨科专家去台湾和她的医生会诊。

回家后，蒋夫人雇了一个几年前就认识的年轻护士，这次来值夜班。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据那位护士讲，因为“要频繁的按摩。”她刚开始习惯这项工作，夫人的外甥女“孔令伟给我和夫人一个新式‘武器’——一种新型的按摩器，外形像个手榴弹。孔令伟把它绑在我手上，然后打开电源。机器可以直接做按摩，可是它非常重，而且强烈的震动让我很不舒服。可是，蒋夫人很喜欢。从此以后，我必须使用这个机器，我的工作更辛苦了。”

在蒋家做护士，做女佣，甚至做个女人都不是那么容易的。大元帅不要女接线员，要是听到女人的声音接电话就立即挂掉。60年代，迷你裙很流行，一个年轻护士到蒋家去看护蒋夫人。正巧大元帅在他妻子的房间里，看到这个年轻女人蒋皱起了眉头。第二天，他把他妻子叫到一边：“或许你应该找机会告诉那个新护士不要穿那种迷你裙。太短

了。她的腿都露出来了。她有没有教养？”对于一个有两个前妻以及很多情妇的老男人来说，蒋这种过分保守的观念看起来很奇怪。他甚至反对女人穿宽松裤，直到他死后，美龄才听从医生的建议穿裤子保暖。

1970年10月，事故发生一年后，美龄写信给爱玛说她“好多了”但是“还没有完全康复，”撞车后18个月，她还是觉得“我还没有彻底摆脱交通事故的影响……好一点了，是的，可以做一些事情了，画画，会客，但还是不能完全恢复我平时的日程。最近我那条健康的腿又做了个小手术，因为为了替代那条还没有完全康复的腿，我让这条好的腿过度劳累了。”

同时，蒋，当时从轿车的后座摔到前面，并没有受严重的伤，但是他的牙床碎裂在牙龈里，因此有段时间都不能好好讲话。同时一些更严重的病症也开始显露——前列腺肥大，动脉硬化，背上的毛病——大多数仪式上他都不能站很久。

尽管体弱多病，大元帅还是坚持他倔强、难相处的个性。不愿意放弃“权力”，他变得“越来越被孤立，”台湾的外交部副部长，H.K. 杨说，“没有顾问们坦白、真诚的建议，他在做重大决定的时候存在很大障碍，”连蒋经国“在知道主席的真正意愿前也不愿意任职。”杨还承认蒋“受到自私的，极端保守的蒋夫人的坏影响，”她“热衷于给自己

维持一个崇高的地位，从不考虑在现在这个重要关头做些紧急调整的需要。”

1971年4月下旬，美龄失去了她的哥哥子文，77岁的子文在旧金山参加一个晚宴时去世了。他的遗体被运回纽约，他一直生活在那里，在纽约天安教堂举行了仪式。“蒋介石夫人本来今天要在纽约参加他哥哥，宋子文博士的葬礼，”

《纽约时代》报道。“当她得知中国共产党也要送她姐姐过来的时候，她于昨天取消了行程。”据Li说，美龄当时“已经上飞机了”，听说这个消息后就让飞机掉头回台湾；据经国说，政府担心共产党在密谋“统战陷阱”，也就是，通过姐妹俩制造两个中国统一的隐喻。

庆龄，当时住在北京，拥有后海的一个王府，配备很多佣人。她忽视了之前受的循道宗的训练，举办舞会，和周恩来一起“优雅的翩翩起舞”。“毛也试过，”庆龄的一个朋友说。“但据我所知，不是很灵巧。”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1972年夏天出席了她家的一个晚宴，他像所有人一样，被他的女主人迷住了。“和孙夫人一起吃饭，”他说，“是一种享受。没有别的方式来描述这个充满活力的妇女，她的脸上常闪现出女学生般优雅的笑容，她的睿智没有被岁月抹杀。”经过中国共产党无产阶级文化的洗礼，庆龄依然没有改变和她姐妹们相同的生活标准。她以招待不周致歉作为晚宴的开场白——“我的服务员们都为政治原因跑到农村锻炼去了，新来的

还没有训练好”——然后请客人们将就食物：“老厨子们快要死了，年轻人不想学——他们认为这是不体面的工作。”

美龄写信给爱玛，回应对子文之死的吊唁“全家人都深深感到哀伤，为他还有我的小弟弟子安，两年前去世的——都那么突然，没有征兆——去世之前都没有任何前兆，也没有什么病痛或者不舒服。他们两个人突如其来的死亡相隔时间太近了，使我们更加难以承受这失去亲人的痛苦。”这是她提及她哥哥时的只言片语，我们推定在子文去世前，美龄和他仍然不和，她拒绝承认他哥哥为中国所做的贡献，甚至可能对自己都不承认。

……

子文去世的时候葛龄在台湾，整个夏天都和她妹妹在一起，眼睛开了一次刀。“她正在康复中，可是忽然两个眼睛都得了虹膜炎，必须在灯光微弱的房间里呆上几个星期，”美龄写信给爱玛。

“我当然很同情她，因为开罗会议的时候我也面临和她相同的状况。”美龄还告诉她的朋友她需要休息：“整个夏天我不断感冒，腿上的神经痛还是发作。”

美龄抱怨她自己的身体的同时，她丈夫也面临着一个令人窘迫的事故。蒋便秘了，为了缓解，经常在他的肛门里塞一个甘油球。在这种特殊的情况下，大元帅的侍从，一个叫Chian的不幸的男人，塞了两个球到肛门边上的一块肌肉里——这个错误导致蒋大量出血，必



▲ 晚年蒋介石与宋美龄

须进行外科手术，蒋度过了一个月痛苦不堪的恢复期，这段时间他既不能坐也不能站。蒋把 Chian 扔进监狱，但是经国想根据军事法释放他。直到一个家庭成员建议把这个人拘禁在总统府的警卫室里，让他就不能跟任何人提起这场事故，争端才平息。夫人不止一次告诉 Chian，“你毁了总统的身体。你是个罪人，”五年后，蒋去世后，她承认“多方面的人来祈求和恳请”，希望释放 Chian。

1972年7月，蒋介石心脏停搏，此后就成了残废。因为不想把他搬到医院去，美龄在中兴酒店组织了一个急救医疗站，在那里蒋陷入昏迷，美龄，孔令伟，

经国都在他身边。据家里的一个成员说，蒋夫人“非常镇静”像“战场上的指挥官”一样主导手术。她命令从军人医院调来的医生和护士在旅馆看护蒋。全天候，没有假期，不管医院的或是旅馆的人都不允许和家里人联系；如果家人问起，就说出差去南方，几天后回家，致使很多医生的夫人们都相信她们的丈夫是消失了。六个月后，蒋苏醒过来，但是仍然不能动，在医院和家里往返，要么在床上要么在轮椅上，每天早晚儿子经国去看望他。

尽管美龄做了预防措施，也发表了些搪塞之词，大元帅病倒的故事还是在岛上流传开了。为了证明丈夫还很好，夫人制造了很多拍假照片的机会——最小的孙子结婚的时候，大元帅在家按传统方式给他们递茶（蒋病的太严重没有参加典礼）；国民党十一届会议期间，蒋跟10个去医院探望他的将军谈话（他的右手必须被绑在椅子扶手上，因为他不能控制手的颤抖）；一次家庭聚会时，拍到蒋抱着他最小的重孙子的场面（那小孩只是被放在那里拍个照）。

就在这段困难时期，美龄失去了她最爱的姐姐，蔼龄。她1973年9月去纽约看望病的很严重的蔼龄，但是在蔼龄去世前四天离开了。美龄的一个朋友说庆龄和美龄都没有参加蔼龄的葬礼，因为两人都害怕遇到彼此。

宋蒋两家的小辈中，美龄最喜欢的还是孔令伟，祥熙和蔼龄的女儿。夫人

要孔令伟来台湾，负责她的一些慈善和非慈善类事业，包括台北的大饭店，妇女组织，她像以前在大陆时一样建立的孤儿院，以及一个为小儿麻痹症患者建立的中心。决定扩建饭店以招待来台湾旅游的外国人时，蒋本人也决定让孔令伟负责这个项目。“在孔小姐的管理下，扩建的资金全用在了项目上，没有一分钱流入私人的口袋，”家里的一个人这么说。然而同时，大多数能胜任这个项目的人都不能跟孔令伟好好相处。在蒋家情况也是一样。她很“讨人厌，”“很多人都不喜欢她。”

蒋夫人对孔令伟一直感到抱歉。因为在孔令伟还是小女孩的时候，有一次得了湿疹，夫人就建议葛龄让她穿男孩的衣服——宽松的裤子，长袖衬衫——来保护她的皮肤，从此以后，孔令伟就拒绝再穿女孩衣服。不管这件事是否有关系，但那时候美龄和她这个外甥女的亲密关系就建立起来了。孔令伟不跟她阿姨住在一起的时候，就和蒋的私人医生所说的“两个自认为是孔小姐的妻子的女人”在一起。她们跟孔令伟年龄相仿，其中一个有丈夫有孩子。

孔令伟常替夫人管家。美龄跟她丈夫及家里人讲上海话，但跟孔令伟说英语，为了不让佣人们听懂。蒋的医生把孔描述成“又瘦又矮……不好看……很蛮横，”孔令伟决不会去冒犯大元帅或者夫人，但“对于其他人，她总是颐指气使。”她很狡黠，是美龄的“美国联

邦调查局”，向女主人报告别人的过失、流言。这一点，在一个中国式的大家庭是很实用的，但后来蒋心脏病发作的时候则逆转了。孔令伟对医学很有兴趣，买了很多这方面的书，包括如何饮食和服药的，然后就开始干扰医生们诊治，坚持认为他们的方法和开的药是错的。鉴于她在蒋家的地位，大家都很怕她，美龄好不容易才阻止了她外甥女继续批评她丈夫的医疗队。

蒋去世前一年，美龄策划了一次小小的胜利，会见即将返美的美国驻中华民国大使华尔特·马康卫。夫人很关心台湾跟美国的关系，因为中国大陆已经加入了联合国，日本也断绝了和台湾的外交关系。她邀请大使共进晚餐，让蒋也坐在椅子上欢迎客人。尽管他发出的只是喘息声，美龄使事情进行得很顺利，会见时仍如往常一样充当翻译的角色。同时，告诫她不要让蒋离开心脏监护器太久的医生们，在餐厅外十分紧张地等待着，手里拿着氧气瓶。

……

蒋的心脏第二次停止跳动时美龄进来坐在他丈夫床边。医生又给蒋打了支强心针，还准备给他打第三支，这时美龄说，“停下来吧。”那时刚过午夜，岛上突然刮起了一阵飓风，接着雷电交加。据经国所说，“父亲要去世了，大雨倾盆而下，狂风呼号，好像整个宇宙都为了哀悼他而变色。”为经国立传的作者补充，“即使是受过哈佛教育的军

官都认为这不只是一个巧合。”

除了恶劣的天气，据《纽约时代》所述，蒋的去世“并没有对中国国民政府的政治活动或者这里的人们的政治士气产生多大影响。”《时代》把这归因于经国表现得“像一个赢得大多数人信心的坚强的领袖。”《新闻周刊》更进一步：“事实是蒋的去世对政治几乎没什么影响。”被问及对经国继承他父亲有何感想时，台北美国大使馆政治部的一个成员说，“感觉很好。感觉是一个务实的，有商人作风的中国人即将替代那个步履蹒跚的老头子。”

按照传统，经国和纬国把他们的父亲用白布包起来安葬。蒋留下遗嘱，号召所有支持者继续与共产党战斗，光复大陆。他还留下遗言说不要把他的遗体放在纪念堂里，而要安葬在山里慈湖边的陵墓里，这样有一天他的遗骨就能被运回大陆。

56

1979年9月，蒋死后五个月，美龄前往美国，带了近12个私人助手和护士。从此以后，除了特殊活动之外，她都定居在纽约。

离开台北的时候，她说她近两年身体都不好，“因为总统的身体关系，我不能治疗我自己的病。”她丈夫去世那年，她被查出患有乳腺癌。据爱玛说，她“打起精神去纽约接受进一步的治疗。”

她离开或许还有别的原因。据说蒋夫人和她的支持者们认为蒋死后她应该

成为国民党的主席，但这个想法被党内的元老否决了。然后她试图扶植孔令侃。当这也遭到反对的时候，这个大元帅的遗孀意识到自己在政治上已经是多余的了，于是离开了台湾。蒋经国去机场送她，并把她搀上飞机。

10月份她邀请爱玛到孔宅做客——现在属孔家的孩子们所有——在长岛。

“美龄看上去还是那样，”爱玛在她的日记里写道，“但是上下楼梯需要人搀扶。胸部作了切除手术，所以右手臂很疼，左腿也是，那次撞击的后果（1969年的车祸）。有两个特工人员，还带了两个她的自己人，一个训练有素的护士，一个保姆，一个厨子，等等。”不久以后，美龄生病了——“三个半月，病得很严重。皮肤和神经疾病。”

尽管美龄公开说明自己患了带状疱疹，1976年4月她还是回台湾参加她丈夫去世一周年的纪念活动。6月，她写信给爱玛说她“还是很痛……发炎的神经根还是没有被治愈；它们受损很严重。部分皮肤的表面是完好的，但还是有很多恼人的红斑，还有发炎的神经末梢，这些都让我感到剧烈的疼痛——经过了漫长的六个月后还这样。”几乎是一年以后了，她写信给周以德^[1]，她说她“渐渐从漫长的痛苦中解脱”，带状疱疹“那种疼痛真的是极其折磨人的，有时几乎难以忍受。”四个月离开台湾的时候，她宣布现在她的旧伤使她患了溃疡以及肌肉痛，在回长岛之前要去巴尔的摩的

约翰·霍普金斯医院检查一下。

尽管这段时间美龄和魏德迈看来没有什么联系，将军跟她的外甥，也就是她纽约的公寓的业主（或者说是共有人），孔令侃，有书信往来。他们交换礼物和问候，显然孔令侃不喜欢人家给他写信时标注大卫·孔收。“所有我这一代，也就是第76代，名字里的中间那个字都是‘令’，”他告诉魏德迈。“这样中国学者就知道我是哪一代的。我父亲那代都是‘祥’……我非常为我的中文名字和我的祖先骄傲。我不需要一个犹太国王的名字来美化它。另外，我不认为我不会像他那样不贞，然后一次又一次后悔！尽管很有趣，但是这样实在太累了！”

一年后，收到魏德迈的一封邀请电报后，夫人的外甥这样答复：“我说了地址要写成‘给大卫·令侃·孔。’1978年2月11日的信里我已经跟你解释过原因了，我很为我的中文名字骄傲，孔令侃，或者令侃·孔，也为我的中国祖先骄傲。如果你能让你的秘书把通讯录改一下，我将感激不尽……我真希望自己参加过陆军或者海军，这样我就可以给自己署名了，像你一样，有一个合适的头衔，例如上校，将军，海军少将，海军上将，不管是什么。”

美龄在美国和孔家人一起生活——在孔令侃曼哈顿的公寓，或者在拉丁镇，蝗虫谷，长岛的孔府。那里的邻居们说从来没有看见过她，只看到豪华轿车开

进开出，据拉丁镇的市长说，“她在这里住了三十年，可直到她离开都没有人知道。”她在当地的美发沙龙洗头，不过都是周日或者假期，镇上的购物中心关门的时候。人家看到她进门的时候有“两汽车的随从”，她在房子里的时候，两个中国保镖“在外面紧张地踱来踱去”。一个便衣驻扎在房子门口，美国政府持续给她派遣警卫。“我时不时看到她那该死的豪华轿车经过，”当地报纸的一个编辑说。“她一定是疯了，现在美国已经注意到了，并且决定承认中国那里有着9亿人口……就我个人而言，我不关心她的想法。我唯一想写的关于她的事情就是她的讣告。我认为她给世界制造了很多悲剧。”

那是格雷西广场10号一座复式公寓，纽约最美的建筑之一，俯瞰东河。有18个房间——7个家庭成员的卧室以及很多佣人房——装修风格很独特，地板上铺满地毯，还有很多织锦缎。红色是主色调，美龄的卧室里摆着一张她自己的大幅照片，以红色丝绸作为装饰。可供人参观的房间里有漂亮的玉和象牙，好看的画，还有中式的陈列橱，但是这个大房子里的西式家具有点雕饰过度，比较夸张。

据格雷西广场10号的另一个房客说，蒋夫人不常出现在这幢楼里，除了进来和出去的时候，“身形如此的挺拔，看上去像个小姑娘，即使事实上她已经九十几岁了。”她养了三条小狗——据纽约一个专栏作家所述，“和它们的百

岁女主人一样，变得越来越老，摇摇晃晃。”由于她的一些工作人员不愿意搬去纽约，她助手的人数有点减少了。但是，她雇了24个佣人（作者猜测是分三班，8个人一班），他们中的大多数住在附近一个小一点的公寓里。这个专栏作家还说，格雷西10号发生了麻烦，因为夫人的邻居们“闻到中餐辛辣的气味，还有做北京烤鸭时冒出来的烟。”一个邻居认定鸭子被挂在厨房的窗子外面，烧菜时难闻的油烟味弥漫在电梯里。然而最后，大楼里别的业主抱怨的不是气味，而是蟑螂。“喷了杀虫剂，”专栏作家报道说。“检查员来确认灭虫行动是否成功。检查每个人的壁橱或碗橱是有教育意义或者说有趣的。检查曾经是世界上最有权势的女人的这些东西则更有意思……或许某个壁橱里全是金条，我说的诺克斯堡^[2]，不是好时巧克力哦。”

在曼哈顿的家里，大元帅的遗孀通过美国和中国的报纸了解国际事务。1979年，她为“船上的人”发起呼吁，甚至还在《纽约时代》上发了个告示谴责越南放逐他们的行为，呼吁“国家扩大领土”收容他们。她偶尔会跟爱玛·米尔斯通信，1980年4月写信说她之所以没有联络是因为“流感痊愈之后，我又得了膀胱炎，现在还在治疗。由于这样那样的毛病，我已经两个多月没出门了！”

第二年，1981年5月29日，90岁的庆龄在北京去世了。在外甥孔令侃离

开大陆之前，她把自己的重要文件交给了孔。他这么写信跟一个朋友说，“她不想让它落到共产党的手里。她甚至给了我几把总统的手枪，说她不希望用它们来对付‘你们这些人’。的确，她反对政府，但她不是共产党。我从来都对她的正直无比崇敬。”

去世前三个月庆龄写了她最后一篇文章。作为一个文化大革命的坦率批评者，她号召中国人“建立民主的，法治的社会主义制度，这样那种滥用职权的情况才不会再次发生。”她是正义的象征，1957年随中国代表团去莫斯科参加世界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会议，毛签署宣言时，她就坐在他身旁。据说，贾瓦哈拉·尼赫鲁只和两个女性在他的房间里合过影——一个是尼赫鲁夫人，另一个，孙庆龄。

据《华盛顿邮报》的迈克·韦斯科夫报道，去世前两周，孙的遗孀的身体每况愈下的时候，“被授予了中国名誉主席的称号，并在临终前戏剧性地被介绍入党。……为充分利用她的巨大声望，统治中国的共产党……对她最后的日子给与极大的关注……领导们……一个个都陪在她病榻边上。报纸上有歌颂她的文章。每天发布病请公告，这是1976年毛泽东主席去世的时候都没有享受过的待遇。”

孙夫人去世后举行了国葬仪式，治丧委员会向她美国、香港、台湾的亲戚和朋友发去唁电，给每个想来人民大会

堂参加仪式的人提供差旅费。邓小平致悼词，在悼词中他说孙夫人“热切的关注着台湾的未来”，希望这两个中国政府能在不久的将来再次团结起来，进行对话。共产党邀请的人中包括美龄，但是即使她本人想去参加，台湾政府也不会允许。

庆龄生前表达过想要见见妹妹的愿望。据陈香梅说，庆龄甚至写了一封信，让她亲自交给美龄。但看完信后，美龄没有想办法联系她姐姐，只是告诉陈香梅，“我收到信了。”庆龄的遗体被火化，她是宋家后代中唯一一个能够把骨灰运回上海的家族墓地，葬在她父母身边的人。

几年后，美龄收到周恩来的遗孀，邓颖超的一封信。周恩来由于膀胱癌过世，比蒋介石晚了不到一年，他的遗体从医院运出来的时候，数以百万计的哀悼者聚集在一起向他致敬。他为减轻文化大革命的不良后果作了很大努力，而毛则缺席他的悼念仪式，这引起了群众在天安门自发的示威——反对毛的政策，受到了军队残酷的镇压。尽管如此，周的遗孀，邓，一个老革命，写信给美龄试图调解——又一次想把台湾收回中国的尝试。

邓的信从未公开发表过，但是1984年大元帅的遗孀回复了一封“公开信”。发表在《亚洲展望》上，这给了美龄就自己最有趣的问题进行一番长篇大论的机会，都是关于共产党的残酷和不诚

信的，包括中共和苏共。“几年前，在‘四人帮’统治时期，”美龄写信给邓说，“你承受了身体和心理的双重折磨，甚至被逼到了自杀的边缘……想到连你们这种共产党核心层的人都差点落到自杀的下场，真觉得悲哀。”谈到这里，美龄又解释说，当她那已故的姐夫孙逸仙想要为尚未稳固的共和国寻求帮助的时候，苏联人以“提供几枝俄帝国典型的步枪，一些机枪和弹药”作为回答，然后又利用“孙博士的大度和宽容……扭曲事实……在我们国家（种植）共产主义细胞。”对于邓颖超，美龄写道，“中共中央使你陷入一个尴尬窘迫的位置……统一战线是老生常谈了，又想用欺诈的手段达到‘合作’的目的……理智需要，不，是命令大家承认，目前真正的中国在台湾。”



[1] 周以德，美国著名政治家 Walter Judd (1898—1994) 的中文名，曾长期担任共和党籍众议员，是国会“中国帮”和院外援华集团的主要成员，以亲蒋反共著称，曾为支援中国的抗日战争做出贡献，也曾长期致力于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返联合国。

[2] 诺克斯堡，Fort Knox，美国肯塔基州北部路易斯维尔南西南军用地，是美国联邦政府自1936年起存放黄金的地点。

■最高法院副院长奚晓明参观宋庆龄故居



1月27日下午，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奚晓明一行前来故

居参观，馆长金晓春等出面迎接并陪同参观。

■宋庆龄故居纪念馆荣获“2012—2013年度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先进单位”



2月21日，在上海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工作推

进会上，宋故居纪念馆再次获得“2012—2013年度上海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先进单位。

■“笃爱有缘：孙中山夫人宋庆龄”特展在孙中山南洋纪念馆开幕



3月7日，由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孙中山南洋纪念馆联合主办的

“笃爱有缘：孙中山夫人宋庆龄”特展开幕仪式在新加坡晚晴园孙中山南洋纪念馆举行，新加坡总理公署部长兼环境及水源部和外交部第二部长傅海燕、中国驻新加坡大使段洁龙、晚晴园主席钟声坚、上海市孙中山宋庆龄文物管理委员会副主任李竞业、新加坡国家文物局文物机构副司长潘宣辉、晚晴园馆长陈勇强、宋故居纪念馆馆长金晓春等出席了开幕式。

“笃爱有缘：孙中山夫人宋庆龄”特展以宋庆龄的生平为线索，通过130多件珍贵的历史照片、文物和文献，完整地展示了宋庆龄波澜壮阔的一生。

■“方寸之间 历史流淌——孙中山宋庆龄印章珍藏展”开幕式暨《宋庆龄藏中国新兴木刻版画》首发式在宋故居举行



“方寸之间 历史流淌——孙中山宋庆龄印章珍藏展”暨《宋庆龄藏中国新兴木刻版画》首发式，于6月18日在上海宋庆龄故居隆重开幕。本次展览共展出31枚宋庆龄珍藏的孙中山宋庆龄印章，其中有与其从事的革命活动密不可分的官方印信，亦有反映其审美情趣及人际交往的私人藏印。同时首发的《宋庆龄藏中国新兴木刻版画》汇集了20世纪40年代宋庆龄收藏的98幅中国新兴木刻运动时期的版画作品，新兴木刻运动研究专家李树声先生为该书作序。

■ “深情厚谊——宋庆龄与周恩来、邓颖超的交往”展览在天津开幕



8月28日，由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和天津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联合主办的“深情厚谊——宋庆龄与周恩来、邓颖超的交往”展览，在天津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三楼展厅开幕，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党支部书记徐士芳、天津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馆长康金凤等参加了展览开幕活动。

■ “大爱无声”——宋故居聋哑学生志愿服务系列活动圆满结束



今年9月28日是第56届国际聋人节，27日上午，30名来自上海聋哑青年技术学校的聋哑学生来到宋庆龄故居，接受了一次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六名特殊的志愿者通过手语为这些聋哑学生进行了认真地讲解，同学们不仅仔细看、认真“听”，还时不时提出一些问题，而志愿者们也根据自己了解的知识用手语一一作答，让他们得以了解宋庆龄在这里生活和工作的方方面面。

本次活动得到了聋哑青年技术学校的大力支持，不仅安排了专业的手语老师，还选派了数位沟通能力较强的学生来馆接受专业讲解培训，为后期接待聋哑人群做好准备。

该活动不仅得到了校方和同学们的一致好评，还被评为2014年闸北区未成年人暑期活动“创新特色奖”。

■ 宋庆龄故居启动文物普查工作

7月8日，为推进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文物普查工作，故居文物资料部启动文物拍摄工作。本次拍摄与上海灵透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合作，聘请徐汇区摄影家协会的刘金龙摄影师承担拍摄。拍摄工作从主楼陈列文物开始，而后进行库房文物拍摄，按照综合类、瓷器类、纺织品类、书画类的顺序依次进行。拍摄任务时间紧、任务重，大家克服困难，现已基本完成进度计划内的文物拍摄。

9月10日至11日，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文物资料部副主任宫洁菁、文博馆员王宁宁在闵行区图书馆参加了上海市文物局举办了全国第一次可移动文物普查培训班。通过这次培训，基本掌握了数据登录在线平台、离线软件和Excel模板的应用要领，为以后的数据登录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经过讨论，拟定采用离线软件和Excel模板进行文物数据的标准录入。因为本馆之前对馆藏文物的信息采集与现国家文物局要求的信息标准不尽一致，将这些数据标准化将是未来一年工作的重点。

A stylized illustration of a tree with a brown trunk and several large, colorful leaves in shades of green, orange, and pink. The leaves are decorated with white and black circular patterns. A dark brown sign is attached to the trunk, containing white text. Below the sign are three more horizontal bars in orange and yellow, also containing text. The background is white with faint, large, light-colored circular patterns.

主 编 金晓春
副主编 徐世芳
编 委 毛正东 麦灵芝 蒋慈华 傅 强
执 行 王宁宁

主办单位：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
地址：上海市淮海中路1843号
邮编：200030

电话：021-64718833
传真：021-54654810
网址：www.shsoong-chingling.com

内部交流